

新高中歷史科教師專業發展課程
歷史課程知識增益：必修部分

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與蛻變的歷程
(第二部分)

連浩銜博士
(香港大學歷史系名譽副教授)

2007年3月

第五講 由確立新民主主義到開展社會主義建設：20 世紀 50 年代 中國探索現代化道路經驗的回顧 (1949—1960 年)

(一) 緒論：有關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幾點意見

首先，說說有關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應注意的幾點事項：

第一，要考慮用什麼態度去對待這段歷史。

個人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作為一個「範式」(paradigm)去研讀。「範式」一詞之原義見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孔恩著，王道還編譯：《科學革命的結構》，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85[?])。簡而言之，它指一個科學共同體的宇宙觀——“A paradigm is what members of a scientific community share”。其實，孔恩所謂「範式」可解釋為一種「概念的架構」(conceptual framework)。每當概念發生革命性之變化時就會出現新的「範式」。《科學革命的結構》是一本從嶄新的角度去理解科學發展的專著。傳統之觀點認為，科學的發展基本上是科學知識積累的過程。孔恩卻認為，科學的發展乃由一場又一場的革命所構成，每場革命勢必推翻前人的宇宙觀及帶來「範式的轉變」(paradigm change)。

「範式」這個概念及後被自然科學界以外的許多學術領域廣泛應用，如社會科學、歷史學、語言學、文學、文化研究等等。就人類活動的範疇而言，「範式」可被理解為一個獨特的思維、行為模式的框框。須知，生活在某一個「範式」裏的人，很難明白(遑說接受)生活在別的「範式」裏的人的思維、行為模式；他們也許不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有其他「範式」的存在。這種情況確實妨礙了人類之間的了解和溝通。先前提議將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個「範式」去研讀。意思是說，若想了解它的歷史，就要承認它有自己一套邏輯與規範，並去認識這套邏輯與規範，即去理解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必須指出，理解並不等於接受。認識到新的「範式」並不意味著要摒棄自己

的一套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但在堅持己見的同時，我們該承認有無數的「範式」存在這個世界上。承認這些「範式」各自有其存在的價值(即承認矛盾可共存)和嘗試去認識這些「範式」(即嘗試去認識別的文化)，實有助我們培養出一個寬容的人生觀(a tolerant outlook on life)，固可利己，亦可利人(I think that's how the study of history can contribute to the betterment of self and humanity)。

第二，要考慮用什麼方法去研讀這段歷史。

既然本課程專為歷史科老師而設，我們將不會用「中國問題觀察家」(China-watcher)或政治學家(political scientist)的方法，而用史學家(historian)的方法去研讀這段歷史：即從「延續和演變」(continuity and change)的角度去了解當代中國的發展。在此說明，史學家與「中國問題觀察家」或政治學家是沒有什麼優劣之分的，只是用史學家的角度更可了解中國歷史的延續性。

第三，要注意該段歷史的分期。大致上可分為：

- (1) 毛澤東時代，這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
- (2) 華國鋒主政時期，這是一個過渡時期，它有強烈的毛澤東時代的色彩，但同時有創新的一面；
- (3) 鄧小平時代，即「改革開放」的時代；
- (4) 後鄧小平時代，這是江澤民、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繼續改革開放」的時代。

可以說，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甚至包括華國鋒時代，都是「強人政治」的時代。而後鄧小平時代的政治，則是「常人政治」。這個時期，只有做出政績，才能獲得支持。

說到鄧小平時代與毛澤東時代最基本的不同，在於鄧小平否定了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基本原則。兩個時期都出現混亂，但原因不同。毛澤東時期的混亂是政治運動帶來的，而鄧小平時期的混亂是經濟改革帶來的。

(二) 新民主主義的確立 (1949—1953 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社會主義建設並不是立即進行的，而是經過了新民主主義時期作為過渡。這個時期有兩項特色：

第一，在經濟方面，它允許私有制存在；

第二，在政治方面，它體現了由四個階級組成的聯合政府。

政治體制的確立

建國初期，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制度——由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兩個權力機關構成。

基本政治原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生活。

根據中共黨章規定，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以及中央委員會主席(1982 年「十二大」改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各級領導機關由選舉產生。

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它的運作方式是由黨的上級組織聽取下級黨員和群眾的意見以制定政策，當上級組織作出了決定，下級組織便要不折不扣地服從。這個制度規定了黨中央與黨的各級組織的關係，又規定了黨與群眾的關係。理論上，它就是在高度民主的基礎上實行高度的集中。問題是：倘若群眾(多數)的願望與黨(少數)的基本原則出現矛盾衝突時該怎辦？

在政權方面，其本質是「人民民主專政」，即對「人民」實行「民主」，對反動、反革命分子實行「專政」。「人民」的定義由黨決定，且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含義。比如，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共把所有持仇日態度的國民視作「人民」，無論其階級出身如何。到新民主主義時期，又將大資產階級和地主以外的、凡是擁護新民主主義建設的國民當「人民」看待。問題是：怎樣才算是擁護新民主主義建設呢？有法理可依嗎？很多時候，一個人是否「人民」，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當權者的主觀判斷。

另外，由於大局未定，設軍事管制制度。軍事管制制度下設六大行政區：東北(人民政府)、華北(中央人民政府)、華東、中南、西南、西北(軍政委員會)。1952 年 11 月，六大行政區行政機關全改行政委員會。

1949 年 9 月，召開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政協）。政協是建國初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被邀參與第一屆政協會議者包括：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無黨派民主人士、各地區、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的代表 662 人。明顯地，政協體現了戰時中共實行的「三三制」（即權力機關由黨員、左派、獨立人士組成，各佔三分之一）及其主張的聯合政府。當時有民主黨派領袖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制度最民主，因為政協最具代表性，又有很大的包容性。他們尚未認識到，民主黨派是不能與共產黨爭奪領導權的。在此先說明什麼是「民主黨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黨派並非泛指以民主為目標的政黨，而是專指在建國前與中共一起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建國後又與中共一起建設新中國的八個黨派。它們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九三學社、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這些黨派的存在體現了由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制度，而多黨合作的指導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會上通過《共同綱領》，它具有臨時憲法的性質。其中規定了設立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聯合政府。聯合政府由四大階級組成，即工、農、小資產階級(小商販、知識分子、手工業者等)及民族資產階級。政府實由共產黨領導，因為它是工人階級的代表。

當時基本政治策略是「統一戰線」，主要鬥爭對象是大資產階級和地主。在此說明「統一戰線」(united front)與「聯盟」(alliance)的分別。儘管兩者都有相同的目標，即聯繫起利益一致的人士來對付共同敵人，但「統一戰線」卻多了一個目標，即進行內部鬥爭，故「統一戰線」可概括為一個「既聯合、又鬥爭」的策略。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曾解釋說：「統一戰線」與共同敵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而「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是「次要矛盾」；「統一戰線」內部有三個

組成部分，包括進步、中間和頑固勢力；進行內部鬥爭的方針是孤立頑固勢力、爭取中間勢力、發展進步勢力，但內部鬥爭必須有限度，以防止影響「統一戰線」的共同對外，待主要敵人消滅後，才重點解決內部的矛盾。中共採用「統一戰線」去完成革命反映出他們相信革命是要分階段來進行的，把敵人一小撮地、逐步地消滅。

工商業政策的制定

中共在城市的打擊對象是大資產階級。所謂「大資產階級」，即官僚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及外國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是國民黨政府的高級官員，他們擁有當時三分之二的工業資產，這包括 2,858 個大型企業，僱用 750,000 個工人。當時中國另有 1,000 個外資企業，政府當初以徵收稅項及控制市場的手段進行監督，直到中國加入韓戰後才沒收外資企業。政府沒收了大資產階級的企業，將其轉化為國營企業，從此把國家的經濟命脈控制在其手中。

民族(中等)資產階級則是統戰對象。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是利用、限制和改造：

第一，利用：由於中共在工商業方面沒有經驗，所以決定暫時保留私有制，並利用民族資產階級的管理經驗、技能來協助新民主主義建設；

第二，限制：爲了防止私有制弊端滋生，中共同時限制民族資產階級的活動，具體辦法是將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置於國家資本主義的模式下運作。國家資本主義有初級和高級之分。初級國家資本主義即由政府控制私營工商業的利潤，主要方法是政府劃定生產指標及成品銷售價格；高級國家資本主義體現於公私合營企業，由政府派幹部到私營工廠、企業直接控制。直到 50 年代中期，初級國家資本主義是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主要運作模式；

第三，改造：這體現於兩場政治運動。其一是發生於 1951 到 1952 年的「三反運動」。「三反」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矛頭直指在財經部門工作而跟民族資產階級有瓜葛的幹部。該運動把一些貪污、腐化分子清洗，淨化了黨組

織。其二是發生於 1952 年的「五反運動」。「五反」即反對資本家「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它由工人、店員組成的「五反」工作隊領導，矛頭直指整個民族資產階級。「五反運動」是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其結果是一方面加強了中共對工商業的控制，另一方面卻削弱了民族資產階級在統戰上的地位。

農村政策的制定

1950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正式開展。土改最初強調解放生產力，為工業化鋪路。由於共產政權剛剛成立，很多地方的農民仍不敢放膽清算地主。中國加入韓戰後，全國氣氛變得緊張，土改遂發展成爲一場激烈的階級鬥爭運動。爲得到廣泛的支持，中共並不打擊富農，針對的只是地主（富農與地主的分別在於是否參與勞動）。土改的總路線是：「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

土改分爲四個階段進行。首先，發動群眾，由土改工作隊到農村組織農民協會。第二，劃分階級，包括宣傳、劃分、評定、批准四個步驟。第三，開訴苦大會。最後，沒收、分配土地。之後還頒發土地証，以滿足一般農民渴望得到土地的願望。這意味著土地私有制仍然存在。

土改的結果可分爲四點。第一，它消滅了地主階級，鞏固了中共於農村的基層政權。當時中共認爲推翻了地主制就等於消滅了封建主義，因爲地主階級是封建主義的政治代表。但土改是否真的消滅了封建主義？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第二，土改訓練了一批新的、對階級鬥爭有親身經驗的農村幹部。第三，土改確認了土地私有制，以致土地集中及貧富分化的現象很快再度出現。這是由於很多貧農不懂如何耕種，只好把分得的土地賣給富農的緣故。第四，40% 的農民於 1952 年底土改結束後參加了農業互助合作組織。

1949—1953 年的經濟發展

1949 到 1953 年，中國的經濟有很好的發展。在這個時段，工農業年均增長率為 24.45%；其中工業年均增長率是 34.80%，農業年均增長率是 14.10%。增長率高是因為政局趨於穩定。

還須指出，新民主主義時期的經濟形態是「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即有多種經濟成分(如國營、高級國家資本主義、初級國家資本主義、個體)同時並存。

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的提出 (1953 年 12 月)

1953 年 12 月，中共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總任務，即「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為何急於過渡？這大概是因為當前形勢起了急劇的變化：

第一，國內政治、經濟秩序恢復得比預期快；

第二，民族資產階級普遍涉嫌行賄、漏稅等違法行爲，被「五反運動」鎮壓後，已無力量對抗中央政府；

第三，富農經濟在土改後迅速冒起，令中共擔憂及不滿；

第四，中共於 1953 年 7 月韓戰結束後決定開展大型工業建設，故急需加強經濟統制，走計劃經濟(planned economy)之路，即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

當時毛澤東估計總任務要到 1967 年才基本完成，並強調要「逐步過渡」。毛警告說：「把社會主義看作是遙遙無期是不對的，但急躁冒進也是不對的。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過渡，最後全部過渡完。」在此有需要簡單解答幾個問題：何謂「左」？帶引號的「左」與沒有引號的左有何分別？何謂右？不加引號的左是指與右派對立的左派。至於帶引號的「左」，則有特殊的涵義。共產黨相信所有事物的發展都要符合客觀規律，做事做得不對，就會犯「左」或右的錯誤：時機未成熟就去做是「左」；時機成熟還不去做

是右。問題是：可有科學標準來判斷時機是否已成熟？在毛澤東時代，犯「左」的錯誤彷彿情有可原。原因是「左」的錯誤乃犯錯者對形勢估計失誤的結果，其過急行爲也許反映出一份過激的革命熱忱。而右的錯誤則意味著犯錯者違抗中央的既定政策，是極其嚴重的態度問題。變成右派就要被踢出「人民」的圈子，要受到「專政」。所以一般人的心態是「寧『左』勿右」，其影響之深遠，下文將有交代。

(三) 從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 (1954—1956 年)

政制的變更 (1954 年)

1954 年，中國的政治制度出現了重大的變更。首先，取消了六大行政區，即撤銷大區、省、縣、鄉四級制，恢復傳統的省、縣、鄉三級制。這標誌著軍事管制制度的終結。

同年又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此後，人大取代政協成爲最高的國家權力機關，政協則主要發揮統戰功能。會上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是第一部國家憲法，取代具有臨時憲法功能的《共同綱領》。(直至目前爲止的四部國家憲法分別是：「五四憲法」、「七五憲法」、「七八憲法」、「八二憲法」。)

過渡時期的目標

過渡時期有兩個主要目標，分別是：

- 第一，使中國成爲工業化國家；
- 第二，消滅私有制，確立公有制。

中共爲達到上述目標採用了兩種方法，分別是：

- 第一，推行第一個五年計劃；
- 第二，推行農業合作化與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第一個五年計劃(「一五計劃」)：斯大林式工業化的翻版 (1953—1957 年)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執行時間是從 1953 到 1957 年，但編制該計劃的草案於 1951 年已開始，經過多次修改，直到 1955 年 2 月才完成。由於中共對工業化不熟悉，故全盤照搬斯大林發展工業的經驗。「一五計劃」可說是斯大林式工業化的翻版，其特色如下：

第一，按重(工業)、輕(工業)、農(業)次序安排國家進行投資，即優先發展重工業。整個工業計劃建基於 156 間由蘇聯協助興建的工廠，包括：7 所鋼鐵廠、24 所發電廠、63 所機器廠。蘇聯主要提供技術上的幫助，貸款只佔工業總投資額的 4%；

第二，工廠管理制度跟隨蘇聯的「一長制」，即廠長責任制，以專家治廠，強調物質刺激；

第三，強調科技教育。蘇聯派了 10,000 個專家來華；中國則派了 28,000 個技術工人到蘇聯受訓；

第四，建設內陸工業區。重工業的設置，盡量向西北、東北等腹地分散發展，主要為減低核打擊的破壞；輕工業的布局則以接近原料和及市場為原則，主要為減低生產和運輸成本；

第五，強調中央策劃，即計劃經濟。

工業化的良好表現明顯地反映出先工業、後農業的發展策略。「一五計劃」期間，工業年均增長率是 19%，其中重工業和輕工業的年均增長率分別是 25.4% 和 12.8%；農業年均增長率只有 4.5%；工農業年均增長率為 11.75%。

總的看來，「一五計劃」相當成功，其缺點在於過分重視工業的建設而忽視農業的發展。有需要指出，中共中央領導人在「一五計劃」推行後始察覺到工業與農業之間實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首先，中國靠農產品出口來支援重工業的投資，農業低增長直接影響農產品出口及外匯收入，間接影響重工業的長遠發展；其次，輕工業所用的原料主要來自農業部門，農業低增長直接影響輕工業原料的供應，間接影響輕工業的長遠發展；再其次，工業化令城市人口激增，農業低增

長自然導致城市出現缺糧問題，直接影響工人的生活。儘管斯大林式工業化在短期內奏效，但長遠來說，它實不利於中國走工業化的道路。

歸根結底，斯大林用農業來支援工業的發展，故可說這種蘇聯模式只適合農業有盈餘的國家應用。中國是個人口過剩、自然資源相對稀缺的落後農業國，其當務之急是替農業創造盈餘，哪有盈餘支援工業發展？

中央政府面臨農業低增長採取了相應的措施：

第一，對穀、油、棉花、棉布進行「統購」（即計劃收購）和「統銷」（即計劃供應）；

第二，加速農業合作化，這是 1955 年毛澤東提出的主張。在此說明，合作化(cooperativization)是集體化(collectivization)的一種形式，而集體化是改變生產關係的一種方式。毛澤東認為：改變生產關係就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生產力指勞動者、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如土地)；生產關係指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各種不同社會集團在生產過程中的地位 and 相互關係、產品分配形式；

第三，改變投資策略。中共於 1956 年制定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方針，即在堅持工業化的同時，改變優先發展工業的政策，更加重視農業、輕工業，推行按比例經濟發展。由於毛澤東於「二五計劃」執行時期推行「大躍進」，這個計劃沒有實施。

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開展

按照原本的計劃，農業過渡到社會主義分三個階段進行，每階段成立不同性質的生產組織，實行「逐步過渡」：

第一階段，組織非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互助組，目的是集中人力物力以收增產之效，但土地和生產資料仍由組員擁有，收穫亦歸土地擁有者；

第二階段，組織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按「土地入股、土地分紅」的原則運作，即土地屬於合作社，但投入更多土地的社員可獲更多收入；

第三階段，組織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按「各盡所能，按勞

分配」的原則運作，即取締初級社的「土地分紅」。(在此說明：「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和「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兩個準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共產主義的準則。)

又據當初的估計，中國需要通過十五到十八年的時間，才可令農業從非社會主義的合作形式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集體化形式。但實際上，三年就完成了，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事。我們可以從農業合作化的過程看出原因。現詳述如下：

1952 年底土改宣告完成，40%的農民已參加了農業互助組。

1953 年 12 月，中共中央通過了《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由於當時只有 14,000 個試驗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中央遂訂定指標，要在 1954 年秋收時達 35,800 個。到 1954 年春已超額完成，達 95,000 個。

1954 年 10 月，中央提高指標，要在 1955 年春耕時達 600,000 個。為了響應中央的合作化政策，很多地方幹部在 1954 年冬至 1955 年春這個時段違背自願原則，強迫農民組織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影響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1955 年春，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達到 670,000 個，再次超額完成；至此，15%的農民已參加了這種組織。得悉合作化運動趨向冒進，中央領導人鄧子恢、陳雲、劉少奇一致主張放緩發展步伐。毛澤東則用「停、縮、發」三字方針來表達他的意見，這彷彿與鄧、陳、劉的主張並無矛盾之處，其實不然。原來毛認為各地情況不一，因此，政策要區別情況、因地制宜，故有「停(止)、(收)縮、發(展)」的指示，意謂不同地區要實施不同的政策。而最重要的是，毛認為合作化要保持強勁的勢頭，運動總的要「發展」。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長鄧子恢大概不明白毛的意思，聽了指示後即表示合作化運動應「停止發展、全力鞏固」。

1955 年 6 月，毛澤東寫〈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指出合作化運動的高潮就快到來，並批評「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結果，鄧子恢被批判犯右傾錯誤。毛澤東估計：到 1958 春，50%的農民將會參加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 1960 年底，餘下的 50%也將會參加了。儘管毛當時的估計未算過激，但他把鄧子恢打成右傾

機會主義分子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種偏激的「寧『左』勿右」心態頓時蔓延全國，導致所謂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的出現。一般人認為，毛澤東於 1957 年開展反右運動是中國轉向「左」的標桿。個人認為，1955 年下半年「寧『左』勿右」心態的湧現，已寫下了毛澤東時代「左」傾歷史的第一章；這種心態，最終使中國掉進極「左」的深淵。

農村社會主義高潮很快席捲全國。1955 年 10 月，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從半年前的 670,000 個增至 1,313,000 個；12 月，達 1,900,000 個。這時，60% 的農民已參加了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6 年 3 月，達 88.9%。從 1955 年夏開始，中央一再收到各地超額完成合作社的報告，於是中央又一而再，再而三提高指標，誰也不敢提議放緩發展步伐，連毛澤東也認為自己低估了農民的積極性。

1956 年 4 月，部分農村開始組織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使合作化運動步入新階段。中央一再三令五申地方幹部切不可急躁冒進，並要遵守自願互利的原則，但一般幹部惟恐別人說自己右傾保守，都爭先恐後地辦起高級合作社來。同年 7 月，63.2% 的農民已參加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 12 月，達 87.8%，基本實現了高級農業合作化。

在此說明，中國與蘇聯在農業集體化的經驗上是有分別的。蘇聯走「先機械化、後集體化」(mechanization before collectivization)之路，無怪 1937 年農業集體化完成時，90% 的土地已用拖拉機耕作。中國原先打算走蘇聯這條路——先發展重工業，待農業機械化條件成熟後立刻開展集體化。但毛澤東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期間因為相信改變生產關係是解決當前農業問題的最佳方法，故棄用蘇聯模式而採用「先集體化、後機械化」(collectivization before mechanization)的策略，無怪 1957 年農業集體化完成時，只有 5% 的土地用拖拉機耕作。及後，農業現代化一直處於低水平。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當時改造的目標是要將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轉化為公私合營企業。改造的過

程具體如下：

1954 到 1955 年夏，實行「以大廠帶小廠、以先進帶落後」，將資本主義工商企業逐個轉化為公私合營企業。

1955 年 10 月，由於農村合作化運動出現高潮，令城市工商業改造顯得遠遠落後。當時只有 4,800 個私營工廠、企業已轉化為公私合營。據估計，如跟以往方針進行改造，大概需要 10 年時間才能把餘下的 88,000 個工廠、企業完全轉化為公私合營。為了使工商業改造向農業改造看齊，中共領袖會見了最有影響力的資本家，大家達到了加快改造的共識。

1955 年 11 月，中共提出《全行業公私合營規劃》。訂定目標是：全國要在 1957 年底完成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

1955 年 12 月，北京市長彭真為首都制定目標：要在 1956 年底(即比全國提早一年)完成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

1956 年 1 月 10 日，北京公布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本來需要一年來完成的任務，只用了十天。這是由於最具影響力的資本家起了帶頭作用，小資本家只好跟他們走。

1956 年 1 月 31 日，118 個大城市同時公布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基本完成。

1956 年 12 月，中國所有資本主義工商業已轉化為公私合營企業。資本家每年拿取 5% 股息，但失去了擁有和管理企業的權利。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 (1956 年 9 月)：「八大」的歷史意義

「八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標誌著社會主義過渡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建設開始。

「八大」的召開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國際背景。1956 年 2 月，蘇共召開「二十大」。會議結束前，蘇共領袖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全盤否定前任領導人斯大林(Joseph Stalin)，又猛烈抨擊「個人崇拜」，結果令共產主義陣營掀起了一場「非斯大林化」運動(de-Stalinization)，這對中共「八大」有很大影響。由於不

想被批評搞「個人崇拜」，中共在「八大」通過加強集體領導：除主席外增設四個副主席(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擔任)；又復設總書記一職，由鄧小平出任。另外，黨章作了修訂，刪去了 1945 年「七大」時寫進去有關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這句話。

須知，共產黨在每個歷史時期的首要任務是界定該時期的主要矛盾。既然中國快要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共的當務之急就是要界定進入社會主義後的主要矛盾。劉少奇在「八大」宣告：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基本上解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來解決這個矛盾。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八大」對當前主要矛盾的界定，本應令中共走經濟發展的路，但翌年的反右和毛澤東對主要矛盾的重新界定，使中共走向階級鬥爭的路，直到 70 年代末鄧小平啓動改革開放止。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於 80 年代初所界定的主要矛盾其實與劉少奇在「八大」所界定的主要矛盾相同；即是說，中共從 80 年代開始再走經濟發展的路。

(四) 社會主義建設的開始 (1957—1960 年)

由整風轉為反右 (1956—1957 年)

毛澤東一向著眼於端正黨紀黨風，因他相信這是增強黨與群眾團結的關鍵所在。1956 年春，正當中國邁向社會主義的新時代，毛察覺到黨內出現了一股脫離實際、不了解群眾的歪風；比如，不少被派去管理公私合營企業的幹部，被民族資產階級指責其行為不當。毛爲了挽回黨的聲譽，決定對黨員進行整頓批評。

1956 年 5 月，毛澤東提出要貫徹「雙百」方針，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好讓黨外人士批評黨內的種種問題。簡而言之，毛想借助黨外鳴放以配合黨內整

風。他還指示要集中批評「三害」：「主觀主義」（用舊方法去解決新問題）、「官僚主義」（官僚作風）、「宗派主義」（瞧不起黨外人士）。可是，鳴放運動收效甚微，令毛大感失望。反應冷淡的主因有二。其一是 1955 年文藝理論家胡風因批評中共的文藝理論和政策被捕及引發一場「肅反」（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運動，令知識分子噤若寒蟬。其二是絕大部分中共幹部都反對毛澤東發動黨外人士整黨；他們恐怕鳴放會嚴重打擊中共的權力及威信，最終造成失控的局面。

1957 年 2 月 27 日，毛澤東爲了闡釋他對當前社會矛盾的看法，在最高國務院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毛把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區分爲「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並解釋說：「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來說，是非對抗性的。」「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這兩類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他毫不含糊地指出：解決「敵我矛盾」的唯一辦法是進行「階級鬥爭」；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正確方法是「團結——批評——團結」，即用說服、教育、批評、自我批評的方式。其實，這篇講話的目的是要說明「三害」基本上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反映，只有鼓吹鳴放才是解決這個「人民內部矛盾」的正確方法。

3 月 12 日，毛澤東對宣傳部講話，號召「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值得注意的是，毛在 2、3 月的講話並沒有馬上在黨的官方報刊上發表，這大概是因爲黨內仍有不少人反對他搞鳴放運動。但毛似乎終於得到宣傳部的支持。5 月 1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於 4 月 27 日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鳴放運動全面開展。

毛澤東想聽到的，是針對個別官員處事失當或行爲不檢的批評，但批評的言論很快便超越了他心目中的界限，矛頭直指整個共產黨制度。人民大學的學生領袖林希翎指出，「三害」的根本原因是政治制度、人事制度、等級制度不好；另外，又要求按照法律程序公開審訊胡風以伸張正義。《光明日報》的主編儲安平

則指責中共「搞家天下」，並派記者到各大城市組織討論會，讓黨外知識分子發表意見。而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羅隆基，以及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彭文應、宣傳部部長陳仁炳亦在不同場合帶頭大鳴大放，強烈批評現行政策。例如，羅隆基要求共產黨傾聽知識分子的意見及取消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章伯鈞則建議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成爲政治上的設計院，並要求中共在制定政策前和這些組織交換意見。爲何特地提及上述六人？及後將有交代。

當運動開始脫離毛澤東當初的預計時，有人勸他及早剎車，但毛認爲這是「引蛇出洞」的好時機，又說他發動鳴放是「陽謀」；直至形勢超出了毛的控制範圍，他才改變初衷。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爲什麼？〉，結束鳴放運動。18日，又發表毛澤東2月有關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但加進了六條新定的標準——包括擁護共產黨及社會主義建設等，以識別正確與非正確的批評，於是反右派鬥爭正式開展。對於早前言論過火的人來說，這些新定的標準實在來得太遲，他們難逃被打爲右派的命運。首當其衝的是部分民盟負責人。7月初，中共揭露所謂「章羅聯盟」，指控這個聯盟在鳴放期間到處煽動，企圖將所有民主黨派組成一個政黨，與共產黨分權掌政。反右運動隨即擴大化，主要原因是知識分子工作單位的領導幹部大多執行劃定右派數目的政策，不湊夠數不肯罷休。1957—1958年間，全國劃定右派分子55萬多人，他們自此成爲「黑五類」分子。（註：「黑五類」指「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

整風演變成反右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是一般人所說的「陰謀」？是毛澤東所說的「陽謀」？還是另有內情？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個人認爲，反右並不是一個由毛預早布設以達「引蛇出洞」的「陷阱」（毛的確說過要「引蛇出洞」，但這是他在鳴放過火後才講的話）；它亦非「陽謀」（這大概是毛惱了一肚子氣才說的話）。有理由相信：一、毛在鼓吹鳴放當初真的相信大部分知識分子是擁護共產黨的，因此，他希望知識分子支持他整黨；二、知識分子聽了5月1日整風指示後亦相信毛號召鳴放以達整風目的是真心的。當年「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章詒和在憶述這段往事時說道：「無論是儲安平，還是父親，都對毛澤東發動整風的

誠意，深信不疑。」(見章詒和：〈兩片落葉，偶爾吹在一起——儲安平與父親的合影〉，《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年) 問題是：毛想聽到知識分子所批的與知識分子想批的，完全是兩碼子事。到過火的言論湧現後，毛才恍然大悟：原來黨外的知識分子是這麼渴望與共產黨輪流坐莊的，他們對共產黨的不滿又是這麼深。毛覺得被知識分子出賣了，其自尊亦受損。據悉，毛最後決定將整風轉為反右的其中一個具體原因是聽了羅隆基「現在是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領導資產階級大知識分子」這句帶有歧視性的話，令他感覺心痛惱火。反右隨即開展，這次又輪到響應鳴放的人覺得被毛出賣了：不是說過「言者無罪」嗎？為何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訂定新的標準來判斷其批評是否正確？毛與知識分子的關係從此惡化，直至毛死，雙方的隔閡仍未消除，這是鳴放變反右的一個有深遠影響的結果。

鳴放變反右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毛澤東相信階級敵人還存在。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會議修改了「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主要矛盾的分析，提出：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由於這個主要矛盾屬毛所說的「敵我矛盾」，所以他一直堅持要「以階級鬥爭為綱」。

從 1956 年開始，毛一而再，再而三鼓動黨外的人帶頭整黨：1956—1957 年，他鼓動黨外知識分子批「三害」；1963—1965 年，又鼓動貧下中農領導「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到 1966—1967 年，再鼓動青年人(「紅衛兵」) 奪黨委的權。究竟什麼原因令毛一直堅持這個獨一無二的整黨方式？恐怕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我們只能作一些推測。個人認為，毛這份執著在很大程度上與他心裏兩個相互矛盾的信念有關——他一方面深信權力會使人腐化，故共產黨抓權後必然走上腐化的路，而另一方面又堅信共產黨非抓權不可，不抓權必然天下大亂。對他而言，只有借助黨外的純潔力量來端正黨紀黨風才能解決這個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最後要講的是有關後毛澤東時代右派平反的問題。20 世紀 80 年代初，中共

平反了 1957—1958 年間被劃定為右派分子的 55 萬多人，彷彿承認當年的反右運動是個失誤。令外界非常不解的是，上面特地提及的六個人——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陳仁炳、儲安平、林希翎，一直未予平反。為何如此？中共中央於 1981 年 6 月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解答了這個問題：「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換言之，中共至今仍然認為毛澤東策動反右基本上是沒有錯的，因為當時真的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搞事，錯就錯在毛把反右擴大化。這個說法反映出中共絕不允許任何挑戰其權力的言論或行動。

「大躍進」：毛式社會主義建設試驗的失敗（1958—1960 年）

「大躍進」是根據毛澤東的設想推行的。

目標、策略與特色

「大躍進」的目標是：第一，高速發展經濟；第二，達到自力更生；第三，消滅「三大差別」，即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力與腦力勞動的差別。

「大躍進」的基本策略是所謂「一馬當先，萬馬奔騰」：「一馬」指糧和鋼（即「以糧為綱，以鋼為綱」），「當先」指以高指標、高速度帶領經濟發展；「萬馬」指其他經濟部門，「奔騰」指追趕糧和鋼的高速生產。在此說明，當時制定生產指標的終極目的並不是要達標而是要突破指標。「大躍進」的基本方針如下：先定第一個指標，組織第一個平衡，同時放手發動群眾，釋放其潛力，突破第一個平衡，編制第二個指標，組織第二個平衡，突破第二個平衡，一直重複上述的做法，以達到生產建設的高速度。這就是所謂「積極平衡論」的實踐方式，即不要平衡，人為地破壞平衡，追求高速度；破壞平衡就是「大躍進」。

在工業方面，主張「兩條腿走路」，故有「五並舉」的提法，分別是：

第一，農業與工業同時並舉；

第二，輕工業與重工業同時並舉；

第三，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

第四，中央工業與地方工業同時並舉；

第五、土法生產(中間技術 intermediate technology)與洋法生產(先進技術 advanced technology)同時並舉。

最廣為人知、最爲後世詬病的土法生產無疑是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廣建「土高爐」，用土法煉鋼，要在生產鋼鐵方面「超英趕美」。在「大躍進」期間，這個群眾性運動席捲全國城鎮農村，導致「小土爐」、「小高爐」星羅棋布、遍地開花；煉鋼又往往不分晝夜，令全民進入了瘋狂的狀態，嚴重影響其他經濟活動。還有，由於煉鋼的原材料不足，所以很多人竟將鐵製的門窗欄杆、家具、飯鍋，甚至農具都送進「土高爐」作爲煉鋼材料，可惜煉不出合標準的鋼，甚至煉不出鋼來，造成嚴重浪費損失。

在農業方面，於 1957 年秋收後出現了大規模興築水利工程的運動，到 1958 年下半年又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深翻和改良土壤的運動。過分熱忱和無知令上述活動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農民一窩蜂似地在山坡上建池蓄水，又在農田上大搞積肥、深耕、密種，結果在短短一兩年間就將整個中國的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徹底破壞，導致到處出現水災、旱災。其他群眾性運動更加劇了危機，比如，爲了防止麻雀偷吃稻穀，全國搞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滅殺麻雀運動——辦法是日夜不停地敲鑼打鼓製造噪音致使麻雀不停地飛直至倦死，結果是麻雀被大規模滅殺，而新一季的稻穀在剛成熟時就給蟲吃光了。在「大躍進」期間，全國各地還大肆宣揚搞高額豐產的「衛星田」（指產量如衛星般高），其實到處都在虛報生產數字以表示先進，完全脫離實際。

可見，工業、農業「大躍進」體現於一連串反智的(anti-intellectual)、盲目的群眾運動，這反映出毛澤東在發動反右運動後不再信任知識分子，不再依靠他們

搞經濟建設。他要打破專家領導經濟發展的迷信，並想證明群眾的積極性可掃除一切客觀經濟規律所構成的障礙。

爲了組織大規模的農業生產單位以便調動人手進行各式各樣的「大躍進」運動，黨中央又開展了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 年 8—12 月，全國 740,000 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爲 24,000 個人民公社，一般是一鄉一社，每公社平均有 5,000 戶。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制：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其特點是「一大二公」，即「大」型及「公有化」程度高的組織。總而言之，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的大綜合體，在當時被認爲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

須指出，毛搞工業、農業「大躍進」，除了想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外，還希望消滅「三大差別」。故「大躍進」不是一般的現代化而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大躍進」發展過程中的政治鬥爭

農業「大躍進」已於 1957 年秋收後進入醞釀發動時期。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會議通過兩個月前由毛澤東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標誌著「大躍進」從醞釀發動階段全面進入開展階段。

毛澤東早於 1957 年 11 月提出，中國在 15 年左右在鋼鐵產量方面可趕上或超過英國。到 1958 年 5 月，毛肯定了「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十年趕上美國」的口號。6 月，又宣佈「我們三年超過英國，十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從這時開始，一些報章竟然作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宣傳報道，口號越來越不切實際。8 月，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及後，人民公社化運動、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出現高潮，「五風」（「共產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浮誇風」、「幹部特殊化風」）亦泛濫起來。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公社成立後普遍出

現貧富拉平及無償地調動生產隊的勞動力、土地、物資和糧食的現象，當時叫做「一平二調」，是「共產風」的主要特徵，結果導致「平均主義」(egalitarianism)泛濫。此外，「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當時統稱為「三面紅旗」。

北戴河會議後的三個月中，毛澤東、黨中央的其他領導人及地方負責人相繼到農村調查，察覺到各地的經濟工作犯了很多「左」的錯誤。從 1958 年 11 月到 1959 年 7 月初，毛先後召開一系列會議，嘗試糾正這些「左」的錯誤。他提出要學習明朝清官海瑞批評嘉靖皇帝的勇氣，又表示不當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1959 年 4 月，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在這個時段，毛批評「有些人太熱了一點」，「只愛熱」；同時又批評「另有一些人愛冷不愛熱」，是「觀潮派、算帳派」。要注意的是，儘管毛承認運動在實踐方面出了「左」的毛病，但這不表示他認為「大躍進」是「左」傾；糾「左」是在充分肯定「大躍進」的前提下進行的。毛打算在糾正「左」的錯誤後更好地「大躍進」。

1959 年 7 月初，黨中央為總結「大躍進」的經驗教訓和討論未來的工作任務，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把當前形勢歸納為「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並強調「大躍進」的成績與缺點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意思是 90% 做得好，只有 10% 做得不好)。在分組討論中，國防部長彭德懷表示：「人民公社我認為早了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剛發揮，還沒有充分發揮，就公社化，而且未經過試驗，如果試上一年再搞，就好了。」又說：「我們黨內總是『左』的難糾正，右的比較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由於擔心「左」傾錯誤難以克服，彭於 7 月 14 日送給毛一封信，反映「浮誇風」普遍增長，並指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須知，彭上廬山之前剛從東歐訪問回來，期間曾與赫魯曉夫會晤，當時莫斯科盛傳中國經濟出了問題，令毛對彭起了疑心。毛讀過彭給他的信後，於 16 日在信上加上「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印發給山上開會的人看。在廬山公開支持彭德懷的有三人：17 日發言的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19 日發言的湖南省黨委第一書記周小舟，21 日發言的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在遠方的赫魯曉

夫又於 18 日公開批評「大躍進」，令毛澤東更懷疑彭德懷與赫魯曉夫早有預謀。毛遂於 23 日發動對彭的批判，指他表現了「資產階級動搖性」，「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距右派還有三十公里」。

1959 年 8 月 2—16 日，黨中央繼續在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議。毛澤東說：「我們反了九個月『左』傾了，現在基本上不是這一方面的問題了，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了，而是反右」。會議議決：彭德懷在廬山會議的發言和意見書是「具有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彭德懷、周小舟、黃克誠、張聞天四人調離國防、省委第一書記、外交工作崗位。毛還說：「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

1959 年 8 月 18 日到 9 月 12 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所謂「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問題。同時，外事部也召開了外事工作會議，揭發彭德懷、張聞天所謂「裏通外國(蘇聯)」問題。彭德懷被撤職後，林彪出任國防部長。

1960 年，出現了「反右傾，鼓幹勁，繼續大躍進」的「左」傾口號，而一度下降的「一平二調」又重新湧現，令「平均主義」再次泛濫。另外，在過去兩年中所盛行的各種反智的「大躍進」運動最終導致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由於地方幹部繼續虛報生產數字，令國家統購穀物後無餘糧留給農民，大大加劇了農村的災情；1960 到 1962 年的大饑荒使 15,000,000—30,000,000 人死亡。

1960 年 9 月，黨中央提出「八字方針」(即「調整、鞏固、充實、提高」)，11 月又發出周恩來起草的《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即《十二條》)，實行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至此，「大躍進」名存實亡。

值得注意的是，1959 年 7、8 月在廬山上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反映出澤東時代的一個特色：儘管毛一貫「左」傾，但當他察覺到政策在執行上出現了「左」的毛病時，便會帶頭糾「左」，不過，由於糾「左」往往引出右的觀點，糾「左」

終以反右收場。這與及後鄧小平時代的一個特色剛好相反：鄧雖然一貫偏右，但當他察覺到出現了極右的傾向時，便會帶頭批右，不過，由於批右往往引出「左」的觀點，批右終以反「左」收場。

第六講 由「兩條路線的鬥爭」到「文化大革命」： 20 世紀 60、70 年代中國探索現代化道路的努力與挫折

(一) 「兩條路線的鬥爭」的緣起： 所謂「劉少奇路線」的制定 (1961—1962 年)

中國在 20 世紀 60 年代初實現了現代化範式的轉變。當時毛澤東已退居政治局第二線，日常工作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雲等人負責。他們摒棄了「大躍進」時期所謂「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另按「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制定了一條與毛構思截然不同的務實路線，藉以挽救面臨崩潰的經濟。下面先談這條務實路線的具體內容與特色，再談路線背後的政治形勢。

根據「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制定的具體政策

在財政方面，壓縮對基本建設的投資：從 1960 年投資的 389 億元削減到 1962 年的 71 億元。結果是轉虧為盈：1960 年，財政虧損 80 億元；到了 1962 年，財政盈餘達 10 億元。

在工業方面，關閉所有虧本的工廠企業，精減職工，下放城市居民：1961 年，關閉了 25,000 間工廠企業，10,000,000 工人在農村重新定居；1962 年，又關閉了 18,000 間工廠企業，再有 20,000,000 工人遷居農村。另外，集中發展重點工業，強調物質刺激(如實行獎金制度)，恢復專家領導，又設法糾正「大躍進」時期重量輕質的失誤。這裏所說的「質」，不但指工業製成品的質量，還指整個生產過程中對生產資料的運用、對生產的管理等各方面的質量。

在農業方面，當務之急乃解決農民生計問題，辦法是：一、減少公糧；二、提高糧食的統購價格。不過，上述政策並不能促使農業持續發展。毛澤東一直相信改變生產關係是促進農業發展的基本方法，故他自 50 年代中期便帶領中國農民走「集體化」的道路——先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然後把它們合併為「一大二公」

的人民公社。但擔當「調整」任務的劉少奇卻有不同的見解。他認為生產關係亟須符合生產力發展的水平，而人民公社所體現的生產關係實際上比當時中國的生產力先進得多，因此，劉帶領中國農民走「集體化」的反方向——即「非集體化」(de-collectivization)的道路，以爭取農業的持續發展。60年代初的「非集體化」路向體現於下列政策：

第一，縮小人民公社的範圍，這導致人民公社的數目由1958年底的24,000個增加到1964年的74,000個；每社則由大約5,000戶減少到1,620戶；

第二，在確定人民公社三級(即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制的同時，決定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每生產隊大約有20—30戶，其規模相等於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第三，實行「包產到戶」，即以個別農戶為單位進行經營的、以聯繫產量來計算報酬的生產責任制。有需要說明，「包產到戶」並非官方制定的政策，而是一些災情嚴重的地方(如安徽省)的農民自發推行的一種生產方式，後來獲黨中央允許搞下去；

第四，恢復「自留地」，即允許每個生產隊劃出7%的土地來種植經濟作物或搞農村副業，產品不徵農業稅，歸社員所有及支配；

第五，恢復「自由市場」，即允許集市貿易，以增加農民收入(見古華：《芙蓉鎮》的女主角在「自由市場」賣米豆腐賺錢)；

第六，允許公社企業「自負盈虧」。

上述政策中的第三至六項一般統稱「三自一包」，其目的是要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隨著政策推行，農村經濟逐漸恢復。

在教育方面，著眼於提高教育水平：發展正規全日制學校(有別於半工半讀學校)、重點學校(即大學的預備班)，重視書本知識及考試成績；上述政策提高了知識分子的子女進讀高等學校的機會。

在學術研究及文藝創作方面，糾正「大躍進」重「紅」(革命意識)不重「專」(專業知識)的失誤，以發揮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須知，這個政策並非允許思想多

元化，而是鼓勵知識分子多用時間做研究，好為祖國的現代化作出貢獻，比如：

- 一、鼓勵科學工作者多些研究科學理論；
- 二、鼓勵社會科學工作者探索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不同的假設；
- 三、鼓勵經濟學家以利潤和效率，而不是以政治標準，作為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據；
- 四、鼓勵作家和藝術家風格多樣化。

由於黨中央對知識分子的政策進行了調整，特別是改善了他們的工作條件，提高了他們的待遇，又公開強調專家的作用，因此，學術、文藝界出現了一片活躍、寬鬆的氛圍，更出現了一股批判時弊的熱潮。要指出的是，這股批評熱潮與 1957 年的大鳴大放不同：這次提出批評的並非黨外人士而是黨內(尤其是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裏)的知識分子，而他們抨擊的對象並非一黨專政而是毛澤東的領導和政策(尤其是按其設想推行的「大躍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可算是鄧拓(北京市委祕書處主任、記者、史學家、詩人)、吳晗(北京副市長、明史專家)及廖沫沙(中央統戰部長、作家)——他們三人在《前線》雜誌的專欄〈三家村劄記〉上用筆名吳南星發表了 67 篇雜文，利用古代人物及歷史事件，並以含蓄及諷刺的手法隱諱地批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 60 年代初，不少文學作品不再一味描述英雄和壞蛋的典型，轉而描繪所謂「中間人物」的普通中國農民——他們不是黨一向歌頌的完美英雄，而是處於「落後」和「先進」思想之間的、兼有積極和消極因素的、搖擺不定的中間階段人物。作家寫「中間人物」的目的，是要隱諱地批評毛澤東盲目信任農民可以創造奇跡。

「調整」政策制定過程中的政治鬥爭

1961 年 1 月，中共召開八屆九中全會，會上批准了「八字方針」。毛澤東號召發揚實事求是的精神，並說「1961 年要搞一個實事求是年」。會後，中央及各省的主要領導人分別率員到基層作實地調查，為制訂新政策尋找依據。是年 5—9 月，黨中央通過了《人民公社 60 條》、《商業 40 條》、《手工業 35 條》、《林業

18 條》、《科研 14 條》、《文藝 8 條》、《工業 70 條》及《高教 30 條》，「調整」政策立竿見影。(有關上述新政策的內容與特色，見上節)

1962 年 1—2 月初，中共召開中央擴大工作會議(又稱「七千人大會」)。劉少奇在《書面報告》中指出工作上的四點錯失：第一，生產指標過高，基建戰線過長；第二，人民公社實際工作中「平均主義」(egalitarianism)泛濫；第三，權力下放過多，各自為政的「分散主義」(decentralism)傾向嚴重；第四，城市人口過多，加重了城市供應和農業生產的困難。又指出錯失原因在於：第一，建設工作的經驗不足；第二，不夠謙虛謹慎；第三，不依民主集中原則，以致不能及時糾正工作中的錯誤。劉說：「責任首先在中央，其次是省一級領導機關」。

毛澤東沒有逃避責任，他在講話中作自我批評時說：「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我注意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毛似乎同意劉的整體分析，但二人在兩個問題上有嚴重的分歧：第一，有關「大躍進」失敗的原因，劉認為政策上的錯誤決定佔 70%，蘇聯取消援助和連續幾年的惡劣氣候佔其餘的 30%，而毛則認為實際情況正好相反；第二，劉認為經濟仍然處於危急時期，而毛則認為現在形勢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恢復正常。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中央領導人如周恩來、鄧小平、陳雲、彭真等儘管完全認清「大躍進」災難的嚴重程度，又明知是毛澤東所犯的錯，卻不敢當面批評他；周與鄧還公開支持毛澤東思想，雖然在會後又與劉少奇一起落實「調整」政策。唯有林彪的態度最明確，他表示「毛澤東的思想總是正確的」，經濟困難的發生「是由於沒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會後還繼續鼓吹個人崇拜。

1962 年 2 月下旬，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又稱「西樓會議」)，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會議決定按劉少奇的觀點落實各項「調整」政策；另外，劉、鄧在會上正式批准農業生產責任制。

1962年8月的北戴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首次表露他對時局的不滿。他批評生產責任制，並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階級——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存在不存在階級？

第二，形勢——國內形勢是不是一片黑暗，還是有點光明？

第三，矛盾——社會主義是不是就沒有矛盾了，有些什麼矛盾？

毛指出，階級還存在，有階級就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又提出，「右傾機會主義」(rightist opportunism)就是「修正主義」(revisionism)，黨內有人搞「修正主義」。

1962年9月，中共召開八屆十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表示：「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他指出社會上還存在資產階級的影響、舊社會習慣勢力及小生產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又批評所謂三「風」：

第一，「黑暗風」，指中央一些領導人「只講一片黑暗」，「不講一片光明」，毛認為這是「右傾」；

第二，「單幹風」，指黨中央批准的農業生產責任制，毛認為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第三，「翻案風」，指對「七千人大會」後甄別平反工作進行申訴的活動，毛認為這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後，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與經濟基礎(economic base)的矛盾明顯地擴大。毛澤東於是開展戰略部署以解決上述矛盾，最終引發「文化大革命」。如今我們回顧這段歷史，不難理解「文化大革命」為何會發生，可是，當時一般人卻鮮有覺察到中央領導的高層在政策上出現了嚴重的分歧，而雙方的衝突已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二) 毛澤東的戰略部署與黨的進一步分裂 (1963—1965年)

毛澤東戰略部署之一：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

「大躍進」之後的大饑荒，令社會上下士氣變得很差。有見及此，黨中央一致贊成對基層幹部進行整風，但對於整風應採取什麼方法卻出現嚴重的分歧，進而激化黨內的矛盾。現詳述如下：

1962年冬到1963年春，部分地區進行了「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俗稱「小四清」)的整風整社工作。1963年5月，毛澤東根據11個省的情況，頒發《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作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綱領性文件，號召基層的貧下中農領導整風。

1963年9月，鄧小平、彭真頒發《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即《後十條(草案)》)，改變了毛的整風策略：整風改從省一級而非從人民公社開始，由工作組而非由群眾領導。鄧、彭視整風為黨內的事情，故應由黨去領導；毛澤東當然非常不滿。

1964年5—6月，毛澤東認為中國已經出現了「修正主義」，並且認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在我們手裏。」

1964年9月，劉少奇頒發《後十條(修正草案)》，強調「扎根串連」，派工作組到人民公社去領導整風。

1964年12月，毛澤東在一個批語中首次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的概念，這為毛在60年代中期策動階級鬥爭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值得探討的，是這兩個概念的由來。可以說，毛起初認為基層幹部的種種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反映，他因此主張動員群眾去領導整風，及後由於鄧、彭、劉改變了他的整風策略，致使毛認定「人民內部矛盾」已轉化為「敵我矛盾」；即是說，毛相信部分基層幹部已蛻化為一個敵對的「官僚主義者階級」，而它的催生者正是毛所說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要注意的是，1949年之後的所有政治運動，都是從階級鬥爭的立場出發的，其打擊對象不外「地、富、反、壞、右」的所謂「黑五類」分子，所以，當毛重申「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時，一般人實想不到毛這次針對的，並非「黑五類」而是黨內的一些領導人。

1965年1月，毛澤東作反擊，頒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其中規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今後一律簡稱「四清」，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又提出：「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城鄉社會主義陣地」。到1966年春，全國大約有三分之一的縣進行了「四清」運動。毛再一次策動黨外勢力(貧下中農)去整幹部，反映出他的一貫作風。

毛澤東戰略部署之二：開展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整風運動

毛澤東組織理論班子——包括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關鋒、戚本禹等人，準備向黨內異見分子進擊。1963年5月，江青公開點名批判昆劇《李慧娘》和《有鬼無害論》，開展了文藝界的批判運動。是年9—12月，毛澤東批評文化部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他說：「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的、才子佳人的東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不改變，就改名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1964年下半年，文化部對文藝界進行整風，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各個文藝領域，都逃不了被批判的命運。文藝界的批判運動，迅速波及到學術、理論界。還在60年代初，不少學者趁當時較寬鬆的政治環境發表具爭議性的學術觀點，比如：哲學家馮友蘭提出儒家主張的「仁」不獨有階級特性，更體現了所有階級的普遍倫理標準；歷史學家劉節、翦伯贊認為階級調和(而非毛澤東所強調的階級鬥爭)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經濟學家孫冶方斷言利潤和效率是投資的首要考慮，忽視物質刺激在經濟上是不合理和有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楊獻珍表示「合二而一」(而非毛澤東所主張的「一分為二」)才是永恆的、絕對的。他們在這次整風運動中都被點名批判。

在此有需要多說一些有關楊獻珍與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論 dialectical materialism)方面的爭辯。對以馬列理論權威自居的毛澤東而言，楊獻珍以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校長的身分散佈「合二而一」的哲學觀點，當然是個

莫大的威脅。其實，「合二而一」只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綜合」(synthesis) 這個概念的另一種提法，它承認事物自身的辯證發展是通過「正 thesis(肯定 affirmation)、反 antithesis(否定 negation)、合 synthesis(否定的否定 negation of negation)」這個「三段式」進行的。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將黑格爾(G. Hegel)的(唯心)辯證法與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機械)唯物論整合為辯證唯物論，目的是要建構一套不僅能「解釋世界」，且能「改變世界」的哲學。但恩格斯只重複了黑格爾(唯心)辯證法的要點，即沿用上述「三段式」發展的辯證法。毛澤東從「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大膽地批判了恩格斯這個做法：自 50 年代開始，毛就否定了「正、反、合」的辯證法中所包含的「綜合」(即否定的否定)的概念，他認為只有矛盾的對立統一(即肯定的否定)才是唯物辯證法的唯一基本規律。毛解釋說：「最根本的是對立統一。……沒有什麼否定的否定。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發展，每一環節，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隸社會否定原始社會，對於封建社會它又是肯定。封建社會對奴隸社會是否定，對資本主義社會又是肯定。資本主義(社會)對封建社會是否定，對社會主義(社會)又是肯定。」若以觀點來說，「對立統一」就是「一分為二」。

可以說，共產黨對矛盾的普遍性與事物自身的辯證發展這兩個概念是無異議的，但在毛澤東時代，黨內對事物的辯證發展基本上是走向「合」還是走向「分」這個問題，則有嚴重的分歧。由於毛認為「什麼事情都是可分的，都是一分為二的」，所以他相信矛盾的對立的鬥爭是永恆的、絕對的。對毛來說，宇宙萬物都依「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辯證方式發展，這體現於他以下三段講話：

(1)「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都是歷史上發生的。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歷史上消滅。因此，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總有一天要消滅。消滅就是那麼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

(2)「一個消滅一個，發生、發展、消滅，任何東西都是如此。……社會主義也要滅亡，不滅亡就不行，就沒有共產主義。……我就不相信共產主義就沒有

質變，就不分質變的階段了！我不信！完全一種性質，幾百萬年不變了，我不信！按照辯証法，這是不可設想的。」

(3)「我說馬克思主義也有它的發生、發展與滅亡。這好像是怪話。但既然馬克思主義說一切發生的東西有它的滅亡，難道這話對馬克思主義本身就不靈！說它不會滅亡是形而上學。當然，馬克思主義的滅亡，是有比馬克思主義更高的東西來代替它。」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合二而一」與「一分為二」的爭辯，不只是一場哲學上的鬥爭，它還有重大的現實意義。簡而言之，「一分為二」的辯証法是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哲學基礎，而「繼續革命」的主張又是「階級鬥爭」路線和政策的理論依據。可見，在那個時代，哲學、理論、路線和政策是聯繫起來的。問題是：毛是否從鑽研哲學中發現永遠鬥爭(繼續革命)的必要性？抑或是為了使長期發動政治鬥爭有合法性而去尋找理論和哲學依據？這恐怕只有毛自己才知道答案。

1965年3月，劉少奇、鄧小平認為整風運動「過火了」，要「剎車」。毛澤東則認為有人搞「小集團」和「獨立王國」。11月，江青、張春橋慫恿姚文元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對該齣京劇的作者吳晗提出批判，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毛澤東戰略部署之三：抓緊軍權

1963年，毛澤東開展「學習解放軍運動」。1964年，黨政機關學習解放軍，成立政治部。1965年，主張部隊正規化、專業化的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失勢；國防部長林彪恢復解放軍前身(即紅軍)的傳統，將部隊全盤政治化，並取消1955年成立的軍銜制度。1966年2月，林彪委託江青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毛、江、林」集團形成。

(三)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前對若干問題的看法

毛澤東對「大躍進」失敗的看法

儘管毛澤東承認「大躍進」失敗，他卻始終相信「大躍進」的理論是正確的。對毛來說，「大躍進」未能收效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蘇聯突然取消對華援助；第二，連續幾年的惡劣氣候令農業大幅度減產；第三，地方幹部在執行政策時犯錯。毛在 60、70 年代再沒有動員群眾大煉鋼鐵或建池蓄水，這反映出他對上述那種翻天覆地的經濟建設模式有所保留，但他始終堅信社會主義革命必須依靠群眾運動。

毛澤東對以劉少奇為首的務實派的看法

「大躍進」帶來三年饑荒，黨中央的高層領導大多明白這是毛澤東闖的禍，但由於廬山會議的情景還歷歷在目，他們為了明哲保身只好表示支持他的政策，雖然私底下搞另一套，這使毛懷疑他們另有陰謀。毛極不滿他們陽奉陰違，在他的背後搞「資本主義復闢」的一套，又認為這一套與赫魯曉夫搞的一套相同，於是集中批判蘇(聯)修(正主義)，希望國內同志引以為戒。

毛澤東對接班人的看法

毛澤東在 60 年代初已屆 70 高齡，身體又比之前差，故此著急找個了解他心意的接班人，以確保其革命路線能貫徹到底。毛曾有起用劉少奇和彭真為接班人的打算，但由於兩人的表現令他失望，毛遂感到極度困擾。最後，他決定發動紅衛兵運動來進行「文化大革命」，藉以培養年青人的革命意識，希望在他們當中找到合適的接班人，結果又令他大為失望(見下節：「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對 1963—1965 年間經濟復蘇的看法

「調整」政策成效顯著，令經濟迅速復蘇，這可從 1963—1965 年間的經濟數據看出：當時的工農業年均增長率為 15%；其中工業年均增長率為 18%(重工

業 15%、輕工業 21%)，農業則為 12%。可見，中國的經濟在短短數年間不但快速地增長，其發展也比以前均衡得多。毛澤東卻將重點放在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方面，並將「調整」政策批判為「修正主義」。

毛還分別突出大寨、大慶為農業、工業的兩面紅旗。據悉，大寨體現了「政治掛帥」及「自力更新」的原則，而大慶則落實「兩參、一改、三結合」(註：「兩參」指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一改」指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指工人、幹部、技術人員三結合)的社會主義管理方式，故得到毛的表彰。

毛澤東對「資產階級」的看法

毛澤東在私有制被消滅後仍然鼓吹「階級鬥爭」(即鼓吹與「資產階級」繼續展開鬥爭)，令人費解。要明白的是，自 1957 年以來，毛以意識形態作為界定「資產階級」存在的基本準則，他解釋說：「改變了生產資料所有制，不等於解決了意識的反映。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剝削階級的所有制，不等於政治上、思想上的鬥爭沒有了。……資產階級是可以再生的。」

毛在八屆十中全會後一再告誡人們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當時恐怕沒誰真正了解毛的用意；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當前的「階級敵人」無疑是一直企圖搞「資本主義復闢」的「黑五類」分子。我們事後回顧這段歷史才知道毛所指的「階級敵人」(「資產階級」)是誰。可以說，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夕，毛澤東心目中的「資產階級」主要包括下列五類人：

第一，公有制建立以前的資本家、地主、富農——即舊剝削階級的殘餘分子(即使這些人在生產方式的意義上已喪失了作為剝削階級的客觀存在，但在政治上、在意識形態上仍然長期被劃定為「資產階級」)；

第二，仍然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價值標準、思想方式、理論學說等)影響的知識分子——包括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如「民主黨派」人士)，也包括感染了東歐「非斯大林主義化」(de-Stalinization) 影響的部分共產黨知識分子和新一代知識分子(如大專學生)；

第三，展現「自發資本主義傾向」的小生產者——即一般追求回復「單幹」及想「發家致富」的小農，他們在毛澤東看來是「小資產階級」；

第四，「官僚主義者階級」——即於 60 年代初至中期在黨國綜合體裏蛻化出來的一大批官僚主義者，他們形成的一個「藉權營私」的「官僚特權階級」或「新資產階級」；

第五，「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當權派)」——即由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共產黨領導層分化出來的派系，這班人實際上催生及支持上述的「官僚主義者階級」(見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一節)，自己亦成為「新資產階級」的有機組成部分兼領導人。

在此說明，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初，一般人(包括早期由高幹子弟組成的紅衛兵)都以為「文化大革命」與過去政治運動的性質無異，故將矛頭一再指向「黑五類」，直至毛號召「奪權」、「造反」，人們才知道毛的真正打擊對象原來是上述的最後兩類人，亦即早期紅衛兵的父兄輩。可見當時一般人對中央領導高層內的鬥爭及毛澤東的心意是不理解的。

(四)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的政治鬥爭 (1966—1976 年)

可以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文化大革命」。至於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純粹是爲了爭奪權力，還是要確保其革命主張永垂不朽，我們無法得知。可以肯定的是，「文化大革命」自開展後就演變成一輪又一輪、完全沒有意義的權力鬥爭。須知，每個運動的發展都有其自身的動力，是不依人的意志爲轉移的；「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可謂迂迴曲折，其結局亦非毛始料所及，現詳述如下：

政治鬥爭的第一個回合：「毛、江、林」集團與所謂「走資派」的鬥爭 (1965 年 11 月—1969 年 4 月)

1965 年 11 月，由江青、張春橋策劃，姚文元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

官》在上海《文匯報》刊登，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姚文抨擊《海瑞罷官》作者吳晗借古諷今地批評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罷」彭德懷的「官」，指吳有為右派分子翻案之嫌。當時北京市長彭真不知文章早已得到毛澤東肯首，對姚不向中央打招呼就批判他的副市長吳晗感到非常不滿，故實行抵制，不予轉載。姚文在上海發表後，文藝、學術界一度展開了圍繞著《海瑞罷官》問題的學術性辯論，直到毛澤東表態支持姚文元，這場學術性辯論頓時變成一場針對吳晗、鄧拓、廖沫沙三人(即所謂「三家村」)的政治鬥爭(註：吳、鄧、廖乃《前線》專欄〈三家村劄記〉的執筆者，見前面有關「調整」政策的一節)。

1966年5月，黨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倒彭真(北京市長)、羅瑞卿(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陸定一(中宣部部長)、楊尚昆(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所謂「反黨集團」。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又確立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根據《通知》，黨中央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包括陳伯達(組長)、康生(顧問)、江青(副組長)、張春橋(副組長)、姚文元(組員)等人；它是「文化大革命」正式發動後的權力機關，完全掌握了中央實權。

5月底，中央文革小組指使北大激進師生聶元梓等7人聯名張貼大字報批判校長、黨委書記陸平，開創了群眾批判黨委的先例。須知，黨委一向是權威的象徵；北大黨委當時正在領導學生批判「三家村」，忽然變成被鬥爭的對象，令學生摸不著頭腦，大多採取觀望態度。當毛澤東表揚聶元梓的大字報時，清華附中部分學生隨即成立全國第一個以「紅衛兵」命名的組織，意謂「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其他紅衛兵亦相繼成立，以響應毛提出要打碎舊世界的號召。在此說明，這些早期的紅衛兵皆由高幹子弟發起及領導，因為在年青人當中，他們的政治觸角最敏銳，而他們又自視為同輩中最「紅」、最有資格領導運動的人物。這些紅衛兵當時還不知道毛心目中的「階級敵人」就是他們的父兄；他們堅守中共的一貫階級立場，以整社會上的「黑五類」為己任。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要求徹底破除「舊

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學生變得更加激進。劉少奇面對學校的混亂，決定派遣工作組進駐學校。爲了控制局勢及響應毛澤東「階級鬥爭」的號召，工作組一方面認定紅衛兵爲非法地下組織並勒令解散，另一方面又把運動的矛頭指向有「黑五類」背景的師生，令局面變得更加混亂。劉少奇在不知所措的情況下，遂於7月中旬邀請正在華東視察的毛澤東返回北京。

8月1—12日，毛澤東召開並主持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正式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於開會前已宣佈撤銷各大專學校的工作組，在會上又批評劉少奇「鎮壓學生運動」的「路線錯誤」。他還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指出黨中央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其中要求放手發動群眾，規定將鬥爭矛頭指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強調要充份利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並確定中央文革小組爲「文化革命的權力機關」等等。

毛澤東又於8月初公開支持由年青人組成的紅衛兵，一度被工作組壓制的紅衛兵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迅猛發展，並開展了翻天覆地的「破四舊」、「抄家」、「大串連」等運動。從8月中到11月底，毛澤東先後8次在北京接見從各地來「串連」的1300多萬紅衛兵。這是否毛的精心部署？他計劃先把年青人對他的個人崇拜推到巔峰，然後才發動他們去奪權？他放心把重大的奪權任務交給高幹子弟組成的紅衛兵？有關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背後動機，我們只能作一些猜測。可以肯定的是，造當權派的反和革「黑五類」的命完全是兩回事，社會上根本沒有人有心理準備和膽量去衝擊當權派，更難想像那些對自己家庭充滿自豪感的高幹子弟會去革其父兄的命。毛大概明白只有這班自認高人一等的高幹子弟才有膽響應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所以沒有選擇地利用他們衝鋒陷陣，搞個天下大亂，營造好鬥爭氣氛，再等待適當時機發難，以達最終的奪權目的。

由於奪權運動還未開展，各地的紅衛兵當時仍由黨委領導，「大串連」亦由官方安排，故可稱其爲「官辦紅衛兵」。8、9月間，這些由清一色高幹子弟組成

的官辦紅衛兵大事宣揚「血統論」，鼓吹「自來紅」的思想(即強調階級成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個順口溜風靡一時。要了解「血統論」，就要對 1949 年後中國社會的等級差別有基本認識。據當時官辦紅衛兵的通俗說法，中國社會的成員可分為三類十五等：

- 一、「紅五類」——革命烈士、革命幹部、革命軍人、產業工人、貧下中農；
- 二、「麻五類」——小商、中農、上中農、職員、自由職業者；
- 三、「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

高幹子弟就是憑仗其純正的革命血統和優越的社會地位，壟斷早期的紅衛兵運動。他們氣焰之囂張，可謂一時無兩——官辦紅衛兵不但排斥所有非「紅五類」，連普通(平民)「紅五類」也被排斥不准加入。這些紅衛兵採用一貫階級立場，集中對付「傳統上」被整的「黑五類」，他們這樣做實際上轉移了毛澤東訂定的鬥爭方向。

10、11 月間，運動起了變化。10 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講話時說：「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運動才五個月，可能要搞兩個五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毛在這時大概感到官辦紅衛兵已完成其歷史任務，任由他們搞下去將會成為鬥爭當權派的阻力，於是通過中央文革小組掀起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又否定「血統論」，批評高幹子弟一直把持紅衛兵運動，排斥工農兵、普通幹部子弟。上述的立場轉變實際上標誌著造反紅衛兵的興起。所謂「造反」，即以下犯上、犯上作亂，造當權派的反。造反紅衛兵由普通(平民)「紅五類」與非「紅五類」(包括部分「黑五類」)子女組成，其成員在前階段受到官辦紅衛兵的歧視，現在起來響應毛澤東策動的「路線鬥爭」。

12 月，黨中央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等領導幹部，奪權運動正式開展——造反紅衛兵在這場運動中擔當主要角色；強調出身的官辦紅衛兵則成為保守派(或稱保皇派)，開始失勢。

1967 年伊始，「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全面奪權的新階段。當時社會上一向受等級歧視和政治迫害的弱勢(邊緣人)群體都起來參與造反、奪權，加入「革命造

反派」的陣營。造反派成員大抵上包括：造反紅衛兵、工人、職員、藝員、幹部及農民中的激進分子。毛澤東利用他們去奪權，而他們亦藉此機會尋求解放、肯定自我、表現自我。爲什麼奪權運動會如此轟轟烈烈，在這裏就可看到原因。

1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陶鑄因抵制批判劉少奇、鄧小平，被誣蔑爲「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隨即被打倒。與此同時，奪權運動從北京擴展到各地(時稱「一月風暴」)，反映出毛澤東下定決心剷除劉少奇在地方上的「代理人」。上海是北京以外第一個造當權派的反的地方：1月初，「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在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操縱下打倒了市委；2月初，成立模仿1871年巴黎公社的「上海人民公社」(註：建立巴黎公社形式的政權，即以普選形式產生領導，是《十六條》提出的)。但毛澤東於2月下旬指令：「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爲「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又提出：臨時權力機關(即革命委員會)必須實行革命「三結合」(即群眾組織的領導人、當地駐軍的代表、革命領導幹部的三結合)。毛反對巴黎公社形式的政權，大概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堅持一黨專政：「如果都改公社，黨怎麼辦呢？黨放在那裏呢？……公社總要有個黨，公社能代表黨嗎？」；第二，人民解放軍不能接受上海造反派主張的「群眾武裝專政」。

2至6月，形勢急轉直下，黨政機關陷於癱瘓狀況。

首先發生了二月抗爭事件。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委員譚震林等人強烈批評「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的錯誤做法，並提出三個原則性的問題：第一，運動要不要黨的領導；第二，老幹部應不應該都打倒；第三，要不要穩定軍隊。儘管這班老幹部企求力挽狂瀾，其行動卻適得其反，受到毛澤東的責難。中央文革小組遂以此作爲借口，對所謂「二月逆流」事件進行批判。從這時起，中央文革小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爲全國的唯一權力機關。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及造反組織都在它控制之下。國務院各部門成立的文化革命委員會，也直接向中央文革小組匯報。至此，黨中央正式成爲一個「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在林彪、江青等人的鼓吹下，民眾對毛的個人崇拜發展到了瘋狂的地

步(如對毛尊稱為「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極「左」之風一時蔓延全國(如學國流行向毛像「早請示、晚匯報」)。

3月，中央軍委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即執行支(持革命)左(派群眾)、支農、支工、軍管、軍訓)。由於各地方大部分軍隊(毛澤東、林彪所統轄的嫡系部隊除外)都站在中共的一貫階級立場上(而非「路線鬥爭」的立場上)去「支左」，故他們實際上支持的乃階級成分純正的保守派，而對階級成分混雜的造反派則持敵視態度，致使社會更趨分化。另一方面，造反派因不滿「三結合」和軍管、軍訓，故極力阻止革命委員會的成立，這又激化造反群眾與軍方之間的矛盾。

令形勢變得更加複雜的是紅衛兵及群眾組織內部的嚴重分裂——各派皆借毛主席之名互相傾軋，導致全國陷於失控的局面。二月抗爭後，造反派實際上成了政治主流；保守紅衛兵普遍瓦解，繼續存在的則與造反派對抗到底。在保守、造反兩派的持續鬥爭中，保守派以「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批造反派被階級敵人操縱；造反派則以「路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思想批保守派被「走資派」操縱。與此同時，造反派也分裂為兩派：穩健派(成員以社會下層靠上的人居多)和分裂出來的激進派(成員以社會下層靠下的人居多)。其分裂的主因有二：一、在「保」哪一位領導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二、造反派內亞等級(sub-stratum)利益的衝突。還須指出，保守紅衛兵普遍瓦解後，其成員大多加入了造反行列。但奇怪的是，他們不是加入穩健造反派，而是加入激進造反派，這是因為激進派是從原造反派分裂出來的，而原造反派(即分裂後的穩健派)就是保守紅衛兵的老敵人。總而言之，毛澤東動員群眾去造反、奪權，儘管達到其打倒政敵的目的，兼且製造了對他個人的極度崇拜，但他卻沒法防止群眾分裂及沒法控制由此而造成的紛亂局面。1967年初夏之際，各派之紛爭已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全面內戰可謂如箭在弦，一觸即發。

7至9月，爆發了第二次奪權運動，掀起全面內戰。

這次是激進造反派企圖奪軍隊與周恩來的權，起因是他們不滿軍隊站在保守

派的一邊，又誤以為毛澤東要打倒的下一個目標是周恩來。7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組以武漢軍區領導在「支左」中犯了「路線錯誤」，派謝富治、王力到武漢煽動造反派群眾揪「軍隊一小撮不好的人」，結果是武漢軍區領袖把這兩名「中央代表團」成員扣留，引發震驚一時的武漢「七·二〇」事件。江青立即提出「文攻武衛」的口號，煽動武鬥，在全國掀起衝擊軍事機關的浪潮。8月初，極度激進的「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在北京散發誣蔑攻擊周恩來的傳單，煽動打倒周恩來。至此，全國陷於分裂與內戰的困境。9月，毛澤東決定把「五一六(紅衛)兵團」打成「反革命集團」，於是全國又掀起揪「五一六」的新浪潮；由於缺乏明確的政策界限，各對立的派系趁機展開互揪對方的所謂「五一六分子」，造成極其混亂的情況。

從1967年底開始，局面慢慢地回復正常。是年11月，《人民日報》在社論中傳達了毛澤東的「大、中、小學都要復課鬧革命」的意見。1968年7月，中共中央先後發出《七·三佈告》和《七·二四佈告》，正式宣佈解散群眾組織，藉以制止敵對派系繼續武鬥。8月，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工宣隊)進駐學校；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在《人民日報》發表，傳達了毛的指示：「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9月，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都已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20個由軍人控制、9個由革命幹部控制)，形成所謂「全國一片紅」的局面。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作出了把國家主席劉少奇開除出黨的決議(劉於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開封病逝；直到死前，他才得悉自己已被開除出黨)。

從1968年底開始，全國又掀起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浪潮。很多知青因長期呆在落後的農村裏，故感到苦悶、悲傷、徬徨、憤怒。他們可說是失落的一代，又可說是覺醒的一代，因為殘酷的現實激發他們去思考、懷疑、反省。從這個角度看來，知青上山下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

政治鬥爭的第二個回合：「毛、江、林」集團的內部鬥爭與「九·一三」事件的

發生和影響 (1969 年 4 月—1973 年 8 月)

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選出了第九屆中央委員 170 人、候補中央委員 109 人。其中只有 53 人(19%)是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反映出前期的奪權、造反運動打倒了中央領導機構的絕大部分成員。此外，「九大」亦標誌著軍人勢力的上升：九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當中，軍人佔 45%；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 25 人，其中軍人佔 13 個席位；全國 29 個革命委員會當中，由軍人控制的有 20 個。

說軍人得勢，是指林彪與(第)四野(戰軍)的勝利(註：除了林彪統率的四野外，還有其他四支野戰軍——彭德懷、賀龍統率的一野；劉伯承、鄧小平統率的二野；陳毅統率的三野；聶榮臻統率的華北野戰軍)。「九大」還修改了黨章，把林彪作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不過，林彪的勝利並非絕對。儘管「九大」之後取消了由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組，但江青集團的幾個主要成員都進入了中央政治局，與林彪派系的人分庭抗禮，其中張春橋更被林彪視為他的最大政敵。

1969 年 7—8 月，中共中央先後發出了緊急的《七·二三佈告》和《八·二八命令》，飭令各地民眾徹底解散群眾組織並交出所有武器。至此，三年造反正式結束(註：有論者提出「三年文革」而非「十年文革」之說，個人認為正確的命題應是「三年造反」與「十年文革」)。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開展整黨建黨運動，藉以重建黨的威信及遏止四野軍人的坐大。1969 年 6 月，黨委重新在基層出現。11 月，第一個縣委重新在湖南省出現。1970 年 8 月，中央報刊大肆宣揚「黨指揮槍」的革命傳統。12 月，第一個省委重新在湖南出現。隨著各處省委的重建，作為臨時權力機關的「三結合」革命委員會逐步淡出政治舞臺。

1970 年 8—9 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林彪一夥在會議上推舉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註：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已於 1969 年 11 月 12 日病逝)，但由於毛不願重新擔任這個職務，又看破林彪謀取國家主席職位的意圖，故提出不設

國家主席的意見。江青一夥也反對由林彪任國家主席，因此與毛一起堅持不設國家主席，這反映出林、江兩派之間權力再分配的矛盾和鬥爭。林彪不甘計劃敗露，借機攻擊張春橋，結果林在這次會議上的代言人陳伯達遭到清算。10月，黨中央開展「批陳(伯達)整風」運動，矛頭直指林彪。

九屆二中全會後的一段歷史，可謂撲朔迷離，令人摸不著頭腦。按官方的說法，林彪集團爲了解決林想「接班」的問題，密謀叛變。其主要成員包括：林立果(林彪的兒子)、葉群(林彪的妻子)、黃永勝(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吳法憲(空軍司令員)、李作鵬(海軍政委)、邱會作(總後勤部長)。據悉，由林立果成立的一個組織(代號「聯合艦隊」)於1971年3月在上海秘密據點炮製了一個「武裝起義」計劃，稱《「571工程」紀要》(「571」爲「武(裝)起義」的諧音)，以「打倒當代的秦始皇—B—52」(「B—52」是毛澤東的代號)、「推翻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封建王朝」作爲他們的口號和綱領。8月中旬，毛澤東南巡，在各地與黨政軍負責人談話時指名批評林彪，說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是「第十次路線鬥爭」、「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又說「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9月上旬，林彪、葉群、林立果眼見事態嚴重，遂向「聯合艦隊」下達進入一級「戰備」的命令，企圖用炸毀蘇州附近一鐵路橋的辦法殺害正在南巡的毛澤東，但由於毛保持高度警惕兼改變行程，暗殺計劃未能得逞。事敗之後，林彪數人於13日零時左右從山海關機場乘256號三叉戟飛機逃往蘇聯，但座機最後因沒有足夠的燃料墜毀在外蒙古的溫都爾汗荒漠，此乃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林彪之死，一直引起外界猜測。在過去的30多年中，先後在海內外出現了許多不同於官方公佈有關林彪死亡的版本，主要有下列四種說法：第一，「軟禁之說」——斷言林彪不是死於「九·一三」事件中，而是被關押在某個地方；第二，「擊斃之說」——斷言林彪沒上出逃的飛機，他是在北京西山被擊斃的；第三，「導彈擊落之說」——斷言林彪乘飛機逃往前蘇聯途中，被導彈擊落；第四，「綁架出逃之說」——斷言林彪是被老婆兒子劫持出逃的，最後機毀人亡。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綁架出逃之說」。有關此說，可見 Frederick C. Teiwes & Warren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Riding the Tige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C, Hurst & C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這是一本嚴謹的學術專著。其作者指出：林彪一向身體欠佳、處事低調、無政治野心；至於「政變」一事，全是林立果和葉群搞出來的，林彪其實不知情，到最後關頭才被拖上飛機。有需要指出，該書對「九·一三」事件的分析，主要根據林彪女兒林立衡提供的資料；須知，林立衡與葉群的關係極度惡劣，她事後一直想將「政變」的責任全推在母親身上，為父親脫罪。

可以肯定的是，林彪死於外蒙。這樣說是因為前蘇聯派去飛機失事現場的意外調查組人員割下了飛機殘骸中那個歲數最大的男人的頭顱回去鑒定，証實了它「正是林彪的頭骨」（註：林彪的頭部在抗日戰爭時受過傷，其位置正好與該頭骨的傷痕吻合，而且前蘇聯保有林彪於 1938—1941 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詳細病歷，有關林彪牙科紀錄也與頭骨的實際情況絲毫不差）。個人認為，林彪有野心，這可從他利用「文化大革命」打擊其他軍事派系得到佐証。而「政變」一事非同小可，實難以想像林彪對此全不知情。倘若林彪真的是被蒙在鼓裏的話，則黨中央在「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就沒有需要煞費苦心地向人民交代為何「最最高舉」、「最最緊跟」的林「副統帥」竟然背叛毛主席——只需解釋說謀反是林彪的妻兒搞出來的就好辦了。但黨中央沒有這樣做，它堅決進行批林，並且在黨內公開了有損毛澤東聲譽的《「571 工程」紀要》。毛大概知道林彪是「政變」的主謀，自尊心受到嚴重的創傷，因此對林深惡痛絕，寧願付出代價，也不肯讓他脫罪。

1972 年夏，黨中央開展「批林整風」運動，說林「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是「反革命兩面派」。「批林」的理據明顯地欠缺說服力，它激發人們去懷疑、反省：林彪真的想謀害毛主席？如果林彪是「反革命兩面派」，那麼，毛主席當初為何相信他並指定他為接班人？莫非毛主席也上了林彪的當？還是人們一直太輕信毛主席的話？毋庸諱言，「九·一三」事件使毛澤東「天縱英明」的神話在一夜之間破產，它深化了由知青上山下鄉所引發

的信念危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另一個轉折點。還有值得注意的是，「批林整風」激化了周恩來與江青之間的矛盾：周恩來主張批判林彪集團的「極『左』思潮和無政府主義」；江青認為批「左」有影射「文化大革命」之嫌，故指出林彪的錯誤是「形『左』實右」，號召批判「右傾回潮」。而毛澤東深知開展批判「極左」一定會導致從理論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他堅決支持江青一派，認定林彪是「極右、修正主義」。

「九·一三」事件無可避免地導致權力再分配。林彪死後，四野軍人紛紛垮臺；另一方面，不少在「文化大革命」早期被打倒的老幹部(包括鄧小平、陳雲、葉劍英、王震、王稼祥等人)依毛澤東指示被解放復職。周恩來的地位也起了變化：他長期以來只是黨內的第三號人物，現在取代了以前劉少奇、林彪的地位，首次成爲黨內的第二號人物。復職老幹部、實力軍人首腦都站在周的一邊，形成一股新勢力(可稱爲「務實派」或「穩健派」)，並旋即與江青爲首的極「左」派處於激烈的抗衡中。

政治鬥爭的第三個回合：周恩來、鄧小平、復職老幹部與「四人幫」的鬥爭 (1973年8月—1976年10月)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召開，選出了第十屆中央委員 195 人、候補中央委員 124 人。其中軍人佔 30%(註：林彪四野的勢力已被清除)，復職老幹部佔 36%，其餘的 34%是「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人(註：這些人不一定隸屬江青集團，如華國鋒就是一個例子)。又選出了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 25 人。當中「左」派佔 15 人，復職老幹部、軍人佔 10 人。周恩來在會上宣讀了政治報告，而江青集團的王洪文則作了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政治報告指出：「『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正確的」；要求：繼續搞好「批林整風」，發展國民經濟。修改黨章報告說明：刪去「九大」黨章總綱中關於林彪接班的規定；又要求：黨員須具有「反潮流」(即「造反」)的精神。「十大」明顯地反映出林彪死後黨中央權力再分配的新格局。

1973年11月，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首次以美國國務卿的身份訪華，在告別晚宴結束後臨時提議同周恩來舉行一次單獨會談，繼續討論中美雙方的軍事合作問題。周恩來由於來不及向毛澤東請示(註：毛正在睡覺)，便不敢作出任何具體的承諾，只是表示中美雙方今後可各指定一個人繼續交換意見。這就給江青找到一個借口，說周犯了擅自接受美國核保護傘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江青遂提議並經毛澤東批准，成立由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汪東興、華國鋒六人組成的批周「幫助小組」。期後汪、華退出，剩下清一色的極「左」派。據悉，這就是「四人幫」正式形成的開始。

1974年1月，由江青指使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編寫的《林彪與孔孟之道》經毛澤東批准轉發全黨，「批林批孔」運動由此全面展開。問題是：為何將林彪與孔子聯繫起來？據當時官方解釋說，這是因為林彪在私下推崇過孔孟之道。另一問題是：為何特別針對孔子？這是因為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深刻的歷史變革和進步，但當時仍有不少人反對它，這和歷史上法家堅持變革和儒家反對變革有某種相似之處，因此，他希望通過「批林批孔」來進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線方面的教育」，進一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運動推行其間，中國的歷史被歪曲為「儒法鬥爭史」——法家「厚今薄古」，是「進步派」；儒家「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是「復闢派」。江青集團積極推動「影射史學」，實際上是借題發揮，用「批林批孔」為幌子，大批「周公」、「宰相」、「宰相儒」、「現代的大儒」、「黨內的大儒」，矛頭所指呼之欲出。奇怪的是，周恩來主動、積極參與這場針對他的運動：他是「批林批孔」七人小組成員之一，親自起草有關會議通知，並在政治局內部組織學習討論。周這樣做，當然是為了自保和穩住大局起見。他知道「批林批孔」是毛澤東發動的，所以絕對不能流露出半點抵觸情緒；對江青的意見，他也只好附和，以免與她正面衝突。無怪這場運動使當時很多不太熟悉中國政情的「中國問題觀察家」(China-watchers)大惑不解。

在此對毛澤東與周恩來的關係作簡單的交代。1932年10月，周恩來主持寧

都會議令毛澤東挨批，埋下了兩人歷史恩怨的種子。延安整風時，毛把周當作黨內「經驗(主義)宗派」的代表批，周自此擁毛，並多次公開承認寧都會議是他「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可是毛對寧都會議一直耿耿於懷，動不動就要翻出來算老賬。他知道周內心反對「文化大革命」、知道周保護過不少他要打倒的人、知道周得到很多幹部支持、知道周不公開地反對他是因為周沒有別的選擇，毛因此認為周是應該挨整的。不過，毛亦知道周沒有野心取代他、知道周要不惜一切「保持革命晚節」，而他又需要周打理國務，畢竟周始終不渝地貫徹他的政策，故毛要確保周不會如劉少奇那般被整死。鄧小平曾說：「沒有總理，『文化大革命』可能更慘，但可能短一些。」其所言甚是。

毛澤東與江青的關係又如何？毛曾多次對江青作出批評：「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又與她劃清界線：「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他知道江青不懂謀略，樹敵太多，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所以告誡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臺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不要「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要和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搞成「四人小宗派」。另一方面，毛澤東很清楚江青階級立場堅定，知道她是其「文化大革命」路線的最忠實支持者，絕對不會搞兩面派，因此，毛對江青的批評實際上是以教育、告誡為前提的。他認為江青的毛病並非嚴重：「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作。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

1974年10月，黨中央發出通知，在最近期間召開四屆人大。通知又傳達了毛澤東希望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意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11月，廣州青年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三人利用「批林批孔」運動、毛澤東批准貼大字報，以及四屆人大快將召開的機會，貼出了〈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俗稱〈李一哲大字報〉)。該大字報以針對「林彪體系」為幌子，暗裏抨擊極「左」派的「封建」、「法西斯」統治。它進一步提出對四屆人大的期望：第一，用法制保護人民應有的民主權利；

第二，限制特權；第三，保證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第四，對鎮壓人民者實行鎮壓；第五，落實政策；第六，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由於〈李一哲大字報〉體現了年青人對「文化大革命」的反省，它在當時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反響。

1975年1月，周恩來向四屆人大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註：這是重申1964年底三屆人大首次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建設）。會議又通過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即「七五憲法」）。四屆人大以後，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黨中央及國務院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鄧於20世紀30年代在江西與毛一齊挨批，他靠實幹起家，沒有什麼理論。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與劉少奇一起被打倒，1973年復出。有說毛決定讓鄧重返權力核心，是出於在政治上防範挾制周恩來的考慮，後來由於鄧靠緊周，兼且展示強勢作風，使毛意識到重新起用鄧的失算。此說是否屬實，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四人幫」在周恩來病重後密切注視鄧的一舉一動。

2—6月，黨中央在全國掀起了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大肆鼓吹「全面專政論」，即：在政治方面強調階級鬥爭、繼續革命；在經濟方面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推行「平均主義」及否定農村自留地、搞副業等政策；在思想文化方面實行專制和箝制。運動的實質是把所有反對「文化大革命」的人當作「走資派」、「復關派」，對他們實行專政。

8月，開展「評《水滸》」運動，把《水滸傳》一書當作反面教材，說宋江（影射周恩來）是「投降派」，一上山就請盧俊義（影射鄧小平）坐了第二把交椅，把晁蓋（指毛澤東）架空了。運動的主題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所謂「投降派」，矛頭直指周恩來、鄧小平以及大批在1973年復職的老幹部。

10月，鄧小平在領導「整頓」時制定了三個綱領性的文件，分別是：一、《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草稿）》；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草稿）》；三、《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草稿）》。鄧又提出：要以毛澤東的「三項指示為綱」，即：一、學習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二、促進安定團結；三、把國民經濟搞

上去。由於毛澤東的侄兒兼聯絡員毛遠新多次向他匯報，說鄧小平「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又說鄧的「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搞上去了」，毛遂於 11 月決定要解決鄧小平的所謂「右傾」問題。他在批評鄧時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又指出：「有些人總是要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由此展開了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 年 1 月，周恩來逝世。中央政治局通過毛澤東的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對華表示：「你辦事，我放心。」可以說，華的任命是毛澤東力圖調和「四人幫」與務實派幹部、軍人之間的矛盾的結果。

4 月初，發生了上百萬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的運動。4 月 5 日，中央政治局出動民兵、公安清理現場所有花圈，還逮捕了一些人；群眾提出「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最後遭到鎮壓。7 日，政治局撤銷鄧小平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委任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及國務院總理。8 日，《人民日報》批判天安門事件為「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8 月，開展「批鄧」運動；鄧的三個「整頓」文件被誣蔑為「三株大毒草」。

9 月，毛澤東逝世。他在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後曾表示：「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即「打倒一切」及「全面內戰」；「文化大革命」是「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的看法是「基本正確，有所不足」。又指出他一生幹了兩件大事：第一，趕走蔣介石和日本人，並沒有爭議性；第二，發動「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10 月，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人把「四人幫」逮捕，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雖已過去，中國卻面對「三信危機」（註：「三信」即信仰、信心、信任）。

(五) 對「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下面提出幾個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問題，並略加分析：

(1)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文化大革命」在當時被說成是：

- 一、一場發展教育、科學、文化事業的文化革命；
- 二、一場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革命；
- 三、一場自覺地改造世界觀的思想革命；
- 四、一場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經濟革命；
- 五、一場基於人民要求及需要的、自發的群眾運動。

但事實證明，「文化大革命」是：

- 一、一場大革文化命的浩劫，它導致教育水平下降，文藝學術界停產十年，科學技術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拉大；
- 二、一場自己人整自己人的鬥爭(林彪曾說：「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我們原來革過命的人的命」)；
- 三、一場用粗暴、強制手段去改造群眾思想的運動；
- 四、一場對經濟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的大災難；
- 五、一場由最高領導人動員和利用群眾去達到其目的而造成的內亂。

(2) 「文化大革命」所反映的是什麼問題？

「文化大革命」反映了兩個嚴重的問題：

第一，中國在當時欠缺健全的法制，因此無法節制群眾過激的行為，最後導致局勢全面失控；

第二，在那個年代，人們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到瘋狂的程度，結果是一般人都失去了獨立的思考和判斷能力，只會盲目地遵從最高指示。

(3) 「文化大革命」最壞的影響是什麼？

「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的範圍內導致：經濟的破壞、文化遺產的破壞、教育的停頓、文藝創作與學術研究的停頓，以及人性的扭曲。至於哪一樣是最壞的影響，可謂見仁見智。

(4) 「文化大革命」是否全無意義？

儘管「文化大革命」在各方面都產生了極負面的影響，但我們卻不能說它全無意義。「文化大革命」始於毛澤東把群眾對他的個人崇拜推到頂峰，但它卻以個人崇拜的破產告終。它喚醒了整整一代中國人，又使中國最終放棄階級鬥爭，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四人幫」倒臺、「文化大革命」結束，是中國命運的大轉折。

(六) 毛澤東時代的結束：對毛澤東的評價

毛澤東是一個魅力(具有感召力的)領袖(charismatic leader)。毛澤東時代，實際上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群眾運動方式辦事的一人專政的極權(totalitarian)時代。要了解這個時代，就需要了解毛澤東這個人。

認識毛澤東

(1) 毛澤東的性格特點是什麼？

要認識毛澤東，就要從他的性格特點開始，這又可從他的行事看出來。總而言之，他一生反叛、任性、自信心強、不怕邪、倔強、不求人、不認錯、有領袖慾、有霸氣。

我們可從毛澤東的詩詞看出他的霸氣：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詠蛙》，1909年，16歲。)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沁園春•長沙》，1925年，32歲。)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沁園春•雪》，1936年，43歲。)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祇爭朝夕。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滿江紅》，1963年，70歲。)

(2) 毛澤東喜歡什麼？

他喜歡：接受挑戰、讀書、游泳、吸煙、吃辣椒和紅燒肉、看京劇、看雪。

(3) 毛澤東討厭什麼？

他討厭：錢、搞特殊化、貪污。

(4) 毛澤東日常生活的大問題是什麼？

他的大問題是：失眠、便秘、孤寂。

最後指出，毛澤東是個集矛盾於一身的人：

- 一、他享有極權，卻享受不到普通人可以隨意到處走動的自由；
- 二、他想聽真話，卻不能容忍不合自己心意的真話；
- 三、他喜歡挑戰權威，卻不容許別人挑戰他的權威；
- 四、他深信抓權會令共產黨腐化，但又深信共產黨非抓權不可；
- 五、他有仁慈的一面，又有無情的一面；有追求理想的一面，又有務實的一面；有時儼如學者，有時卻像個土包子。

評價毛澤東

儘管毛澤東的治國手法備受非議，但他確實是 20 世紀中國最具魅力和影響力的領袖。他一生反叛、倔強、任性、自信；從不肯約束自己的個性，亦從不會掩飾自己的好惡。他最討厭搞特殊化；窮一生之力去改造人性、追求他那個永遠追求不到的理想。毛勇於迎接挑戰，並善於在劣勢中取勝。他領導革命成功，絕非僥倖。可惜，勝利令他自我膨脹，以致他在晚年容不得不合他心意的真話。他執政二十七年，凡事一意孤行，用自己的過去經驗來判斷當前一切是非、解決當前一切問題，終於導致悲劇收場。可說：毛一生都是過著反抗的生活，習以為常，且視之為普遍真理，強迫人們接受。他認為：「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又作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總結。無怪中國在毛一人專政下，長期處於翻天覆地的動亂中。毛所謂「抓革命，促生產」，最終被他自己的革命實踐否定。

毛澤東在後革命時期堅持繼續革命，在沒有階級的中國社會不斷搞階級鬥爭，造成災難和悲劇。可悲之處，不在於清算了那麼多階級敵人(註：革命基本如此)，而在於犧牲了無數忠誠於共產黨與共產主義的人士。然而，我相信這不是毛澤東本人的意願 (If Mao had created a tragedy, it was a tragedy that never meant to be)。他具有敏銳的觀察能力，覺察到社會上存在很多問題，但他誇大了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又錯定了這些問題的本質。結果是：他用錯誤的方法去解決社會上的問題，最後釀成大悲劇。中國在毛澤東統治下，可謂災來如山倒。個人認為：毛雖無心造孽，卻難辭其咎。

第七講 改革開放：「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資深記者和評論家楊繼繩在他寫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中指出，毛澤東逝世後，中國出現了四股政治力量，這四股力量的代表人物企圖按自己的意願選擇中國未來的道路。

第一種選擇：在政治方面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在經濟方面維持計劃經濟體制。上述取向意味著在政治和經濟上都走毛澤東晚年的路線，其代表人物是毛澤東的繼任人華國鋒。

第二種選擇：在政治方面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原來的意識形態、中共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方面走 1950 年代的路，但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前題下，允許搞一點市場調節，這體現於 1980 年代中期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展後所提出的「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方針。堅持這種取向的代表人物是財經專家陳雲。

第三種選擇：在政治方面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原來的意識形態、中共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方面放棄計劃經濟體制，走市場取向的改革，這體現於 1992 年 10 月中共「十四大」所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線。堅持這種取向的代表人物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第四種選擇：在經濟方面放棄計劃經濟體制，搞市場經濟；在政治方面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實現政治民主化，即背離前三種選擇的方向。堅持這一取向的是一些可稱為自由民主派的在野知識分子。

楊繼繩又指出，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實際上是上述四種政治力量的較量，其中當以鄧小平為代表及以陳雲為代表的兩股力量最強。鄧、陳二人勢均力敵，互相制衡。遇到一些重大決策，更必須要兩個人都同意才可實行。所以，中國改革開放年代的政治力量呈雙峰狀態，但由於鄧小平是實際上的一把手，這

個山峰稍高一些。楊繼繩對後毛澤東時代政局的分析，確是簡明扼要。下面先談華國鋒主政時期的特色，然後說明鄧小平時代中國全面走向改革開放的實況。

(一) 華國鋒時代 (1976—1978 年)：走向改革開放的過渡期

延續的一面

毫無疑問，華國鋒是毛澤東路線的忠實追隨者。爲了貫徹毛的主張，華於 1976 年 12 月召開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又於 1977 年 4、5 月間召開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藉以發揚「政治掛帥」及「群眾路線」的革命精神（按：大寨、大慶是毛澤東在 1960 年代中期爲農業、工業樹立的兩個楷模）。1977 年 2 月，華國鋒支持《人民日報》在一篇社論中正式提出「兩個凡是」的觀點，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值得注意的是，華國鋒把毛澤東的一套與「四人幫」的一套區分開來。他一方面叫人繼續高舉「文化大革命」的旗幟，另一方面卻批判「四人幫」把持「文化大革命」，認爲「四人幫」別有用心，「另搞一套」，違背了「文化大革命」本身的精神，造成災難。

1977 年 8 月，華國鋒向中共「十一大」作政治報告時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決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束。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始終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鬥爭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上述說法充分反映出華國鋒仍然堅持「以階級鬥爭爲綱」的立場。

轉變的一面

由於「文化大革命」嚴重阻礙了中國的經濟發展，致使中國遠遠落後於世界

上的先進發達國家，華國鋒遂於「十一大」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的同時，強調建設現代化強國的目標。他的方法是實行開放政策，放手利用外國資金，並大量引入外國先進技術，以實現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中國對外開放，從此開展起來。

1978年2月，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預算在1977年的基礎上加開百多個投資項目，並撥大量資金購買先進科技。大概是由於不熟悉國際行情關係，中國在1977—1978間引進了不少陳舊、過時的設備。此外，在大幹快上（即大規模從事及快上馬的意思）的思想指導下，進口整套設備的規模往往過大，超過了國家的財政及配套能力所能負擔的。盲目投資引進，浪費了龐大的資源，造成國家外匯不足，更使中國已經失衡的經濟結構進一步失調。華國鋒因此被反對他的人批評搞「洋躍進」，即重覆了1958年「大躍進」的急躁冒進錯誤。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華國鋒失勢與鄧小平時代的開始

1977年7月，鄧小平在以陳雲、王震為首的高幹支持下復職，擔任黨副主席，引發新一輪的權力鬥爭，即以鄧小平為首的「實踐派」與以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的鬥爭。幸虧雙方都以「安定團結」為重，致使這場鬥爭與「文化大革命」時殘酷的鬥爭有很大的不同。鄧小平所針對的，是「兩個凡是」理論，故此，他在復出之前和之後都明確表示要全面地、整體地分析毛澤東思想體系，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兩派的爭論，隨著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經胡耀邦精心策劃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推向高潮，使鄧小平獲得更多的支持。

1978年1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平反了1976年4月5日發生的天安門事件，這表明鄧小平在現階段的鬥爭中已佔上風。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又批評他的「洋躍進」。誠然，十一屆三中全會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因為它標誌著華國鋒過渡時期的終結與鄧小平改革開放時代的開始。鄧小平後來指出：「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

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

(二) 鄧小平時代 (1979—1997 年)：「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我們從幾個方面來看鄧小平推行的改革開放：第一，鄧推行改革開放的目的；第二，鄧推行改革開放的特色；第三，改革開放的過程及影響。

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的目的

扼要而言，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的目的是要藉搞活經濟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解決「三信危機」及鞏固中共的統治地位（按：「三信」即信仰、信心、信任）。

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的特色

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的主要特色如下：

第一，他摒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主張——鄧小平認為，放棄階級鬥爭是實行改革開放的先決條件；

第二，他摒棄了用動員群眾的方式(the mass mobilization approach)來建設社會主義——鄧小平糾正了毛澤東時代不信任知識分子、不尊重專業知識的失誤，他重新重用專家，但同時要求專家全心支持黨的政策；

第三，他擺脫了教條式的意識形態的掣肘——鄧小平堅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故能突破意識形態框框的限制，用務實的態度去領導改革；

第四，他採用試探法(the trial-and-error method)及循序漸進的方式(the incremental approach)進行改革——鄧小平形容改革的過程為「摸著石頭過河」，其政策具高度的靈活性，但往往欠缺周詳的應變方案(contingency plans)；

第五，鄧小平始終在一方面推行經濟自由化，另一方面竭力防止政治自由化。外界很多人因為相信經濟自由化和政治自由化是相輔相成的，因此認為中國

改革開放在這方面的特色實構成一個弔詭(paradox)。這裏必須指出，中共斷不會認為推行經濟自由化與防止政治自由化這兩種政策有矛盾的地方，因為改革開放不但要發展經濟，其最終目的就是要鞏固中共的統治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任何對中共的統治造成威脅的勢力——無論是真正存在的還是潛在的，都必須被消滅，以確保改革開放能完全收效。

(甲) 農村改革的開展與經濟特區的創立：農業的黃金時期 (1979—1984 年)

鄧小平時代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展的，到 1984 年底才將改革的重點轉移到城市。

農村改革的開展

農村改革從 1979 年開展，它體現於農村經濟形態的根本轉變，即由一個「指令經濟」(command economy)轉化為一個以「承包制」(contracting out system)為基礎的經濟。所謂「承包制」，是指國家把土地劃分給農民經營耕種，雙方協定一個生產指標，若產量超過協定指標，則超標部分的農作物算是農民所擁有，從而達至「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結果。誠然，1970 年代末出現的「承包制」，其實並非政府制定的政策而是農民的創舉。它首先由安徽省某些農民私下實行，隨即迅速普及，之後更獲得官方批准。上述情況與 1960 年代初所發生的情況無異：當時同樣是安徽省某些農民為了解決生活困苦而私下實行「包產到戶」，經普及後才得到官方批准。無怪鄧小平在談及「承包制」時這樣說：「(它的)發明權是農民的」。總而言之，「承包制」使農民多勞多得，它把農民在生產上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故能收到立竿見影之效。

此外，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的中國農村又呈現了經濟多元化(economic diversification)的新趨勢，即農村副業的復興與鄉鎮企業的出現。中國的鄉鎮企業由於所處地理環境不同而各自有著不同的特色，例如：以鄉鎮集體經濟為主的

「蘇南模式」、以家庭工業爲主的「溫州模式」及以來料加工爲主的「珠江模式」（按：蘇南是指蘇州、無錫、常州一帶地區；來料加工是指從鄰近的港澳地區運來生產原料，按產品樣式加工，產品則運返港澳並由那邊的廠商銷售）。上述趨勢不只爲中國農民帶來更多收益，還有助於解決中國長期以來因農業人口過剩、耕地不足而導致的勞動率下降問題(the problem of decline in labour productivity)。

從 1979 到 1984 年，農業總產量增加了 50%。在同一時期，糧食生產的年均增長率達 4.80%。1984 年，農產量創了歷史高峰。上述數字反映出農村改革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然而，中國農村還有不少舊的、新的問題仍待解決：

第一，農業產量大大幅度增加，全賴生產積極性得到充分的發揮，但由於農業現代化水平並沒有提高，故農業難以取得持續發展；

第二，農村人口在多勞多得的鼓舞下持續增長，使人均經濟得益繼續偏低；

第三，儘管糧食產量在短期內猛增而收到紓解民困之效，但隨著農村形勢普遍好轉、「指令經濟」失效、農村副業復興，越來越多農民選擇栽種經濟作物，導致糧食產量在 1980 年代中期以後大幅度減少；

第四，人民公社於 1983—1985 年間解體，這使農民失去了他們一向享有的福利，生活缺乏保障。

總而言之，1979 至 1984 年是中國農業走出低谷的黃金時期，但好景不常。自 1984 年底城市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以來，農村的境況每況愈下，並出現所謂「三農」（即農業、農村、農民）問題，詳情容後再作交代。

經濟特區的創立

1979—1980 年間，中共中央創立了四個經濟特區，即廣東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以及福建省的廈門市。值得注意的是，它們並非一般特區，而是「經濟」特區，即中央用來試行特殊經濟政策的區域。經濟特區的主要作用包括引進外資和先進技術，試辦中外合資企業，以及發展對外貿易。1992 年鄧小平

南巡時說：「回過頭看，我的一個大失誤就是搞四個經濟特區時沒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現在長江三角洲，整個長江流域，乃至全國改革開放的局面，都會不一樣。」但該承認，劃定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為經濟特區是當時領導人周詳考慮的結果：首先，這幾處地方鄰近香港和台灣，有利於吸引僑商及外商投資設廠；其次，它們遠離北京，要是出了什麼問題也好控制。誠然，設立經濟特區，是黨中央按循序漸進方式進行改革開放的一個具體表現。

「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與第一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開展

1979年3月，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指出，中國若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分別是：第一，社會主義道路；第二，無產階級專政（1981年改為人民民主專政）；第三，共產黨的領導；第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在討論黨的領導時說：「事實上，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誰來組織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誰來組織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在今天的中國，決不應該離開黨的領導而歌頌群眾的自發性。」可見他尤其重視這項原則。

鄧小平提出「四項基本原則」（或稱「四個堅持」），是因為他覺察到社會上吹起了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風，這主要體現於：第一，傷痕文學的湧現；第二，民間民主運動的興起。

以批判「文化大革命」為主題的傷痕文學，是從1978年開始流行的。當時正好是「實踐派」與「凡是派」交鋒的關鍵時刻，鄧小平為了結合反「左」勢力與「凡是派」抗爭，自然對任何反「左」的言論都給予支持，傷痕文學因此應運而生。惟鄧小平掌權後，發覺不少這類作品不僅暴露「文化大革命」的慘況，還嚴厲指控整個社會主義制度，實有加劇「三信危機」之嫌。他遂決定取締傷痕文學。1981年3月，鄧小平點名批判白樺寫的《苦戀》，並指出「這是有關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苦戀》這個文學劇本所描寫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在極「左」年代生活的悲劇，劇中主人翁是一個在50年代從美國回歸祖國的名畫家，卻被「文化大革命」弄至家破人亡。白樺通過畫家女兒的口說：「爸爸，您愛我們這

個國家，苦苦的留戀這個國家，可是這個國家愛您嗎？！」鄧小平在 1981 年 7 月進一步解釋他為何認為有需要批判《苦戀》：「無論作者的動機如何，看過以後，只能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共產黨不好，社會主義制度不好。這樣醜化社會主義制度，作者的黨性到哪裏去了呢？……這樣的作品和那些所謂『民主派』的言論，實際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鄧小平所說的「所謂『民主派』」，是指參與 1978—1981 年間民主運動的人士。1978 年 11 月，受到 1976 年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影響，北京、上海及廣州等地掀起了一股被外國評論者稱為「北京之春」(Peking Spring)的民主浪潮。具體來說，這是一場群眾自發的、以「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方式進行的民間民主運動。當時北京市西單長安街的一片牆的大字報最引人注目，因此這裏「民主牆」(Democracy Wall)之名不脛而走。除大字報外，以論政為主的民辦油印刊物亦像雨後春筍一樣蓬勃起來。據估計，到 1980 年就有 120 多份不同的民間刊物出現在全國各地，其中比較有名的包括《北京之春》、《四五論壇》及《探索》等。必須要知道的是，這次民運的活躍分子，大多屬於所謂「覺醒的一代」，即是說，他們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洗禮，並進行過反省的年青人。他們有抱負、有理想，不滿現實、不滿意「人民當家作主」只是一句口號，故借「凡是派」失勢的歷史契機，希望使這個「人民當家作主」的口號成為事實。由於中國剛剛實行改革開放，所以這班年青人當中絕大多數並不認識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可以說，「北京之春」的中堅分子如徐文立、劉青、傅申奇、王希哲、陳爾晉等人，皆可稱為「社會主義民主派」——他們主張的，是馬克思主義民主；嚮往的，是巴黎公社形式的政權；鼓吹的，是建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當時只有極少數人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民主派」，其代表人物是主張「第五個現代化」(即歐美人權、民主)的《探索》主編魏京生。1979 年 3 月，魏京生因在〈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一文中呼籲「人民必須警剔鄧小平蛻化為獨裁者」而被捕；10 月，他被判 15 年徒刑。由於鄧小平認定這次民主運動「破壞安定團結，

妨礙經濟發展」，因此民運的主流派——「社會主義民主派」亦難免於難。1981年4、5月間，中共在取締傷痕文學、大字報及民間刊物的同時，全面逮捕民運人士，以遏止「自由化」傾向。

統一認識：《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制定

爲了統一認識以解決「三信危機」，中共中央遂於1979年11月開始著手起草一個重要文件，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作一個總結。這個文件就是先後經過4,000名高級幹部討論，及七次修改才定稿，即最後在1981年6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討論期間，外界盛傳中國將爆發「非毛化」(de-Maoization)，即「貶毛」運動，然而，它沒有發生。據悉，在起草和討論《決議》的過程中，的確產生了分歧——有人提出廢棄「毛澤東思想」，另外有人認爲《決議》對毛澤東批評得不夠，還有人對毛的品格提出了質疑。惟鄧小平與陳雲這兩位元老級人物同時指出，全盤否定毛澤東就等於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會動搖中共的領導地位，因此，不能丟掉毛澤東這面旗幟。中國沒有出現像1956年蘇聯全盤否定斯大林一樣的「貶毛」運動，可以說是鄧小平與陳雲的決定。

《決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指出毛的領導以1957年爲分界線：前期一貫正確；後期犯了一連串的「左」傾錯誤，包括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以及「錯誤發動」了一場「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總而言之，《決議》否定了毛澤東的晚年，但肯定了他的一生。

《決議》將「毛澤東思想」重新加以解釋：把「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個人的思想區分起來，前者是中共集體智慧的結晶，並可概括爲「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及「獨立自主，自力更新」三個原則。至於毛澤東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決議》指出這是一個「左」的理論，不是「毛澤東思想」的一部分。個人認爲上述說法其實並不合理，因爲我們可以完全反對「繼續革

命」，但我們不可以說該理論不屬於「毛澤東思想」，因為「繼續革命」實際上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

《決議》又指出，社會主義中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與 1956 年劉少奇在「八大」所指出的一樣，即意味著當前的工作重點將重新「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決議》還指出，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必須同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中共「十二大」的召開

1982 年 9 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開，確立了外界所稱的「鄧胡趙體制」或「三頭馬車」領導局面。處於第一線的是胡耀邦和趙紫陽，前者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十二大」不再設中共中央主席），後者出任國務院總理。鄧小平則只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沒有擔任黨和國家的最高職務，這成為鄧小平時代權力結構的一項特色。

「十二大」制定了中共在 80 年代的三項主要任務，包括，第一，「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語）；第二，爭取祖國統一；第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鄧小平又強調要抓緊四項工作：第一，實現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及專業化（即「幹部四化」）；第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第三，整頓黨風；第四，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的年總產值由 1980 年的 7,100 億元增至 2000 年的 28,000 億元（即翻兩翻）。

「十二大」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標誌著「實踐派」全面掌權，並確定經濟建設是解決國內外問題的基礎。

「清除精神污染」運動的開展

「十二大」前後，由於政治上出現了比較寬鬆的氣氛，知識界又再次活躍起來。當時不少黨政機關內的高級知識分子紛紛發表言論，一方面批評時弊，另一

方面敦促政府維護人民的權益。他們借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alienation)概念，來解釋中國在社會主義下的消極現象（按：馬克思抨擊資本家把工人創造的勞動及財富異化為統治工人的力量），又援用馬克思的經典論著來說明社會主義社會應十分關注「人道主義」(humanitarianism)問題。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兩個人物分別是《人民日報》的副總編輯王若水及當過中共文藝主管的周揚。

王若水在〈社會主義異化論〉一文中指出，社會主義仍然存在著異化現象，如人民公僕往往變成了人民的老爺就是一個好例子。他又在〈抽象的人道主義〉中說，人道主義是一種把人和人的價值置於首位的觀念，它不應該成為資產階級的專利。周揚也在 1982 年的一次講演中談過「異化」問題。值得一提的是，周揚雖然在 50 年代推行文藝界反右，但由於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衝擊，故進行了自我反省，並承認「整人者沒有挨整，不會知道被整的滋味」；他自此支持改革及思想解放。

1983 年 3 月 7 日，周揚以中國文聯主席的身份在全國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學術報告會上作了一個〈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講話。他認為社會主義在發展的過程中，其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都會異化，都會走向自己的反面。他又解釋說，在經濟建設上無經驗做了蠢事，是經濟上的異化；人民公僕濫用權力變成人民的老爺，是政治上的異化；個人崇拜，是思想領域的異化。此外，周揚指出馬克思十分關心人道主義問題，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切問題都應該以人為出發點。據悉，當時任中共意識形態總管的胡喬木看過周揚的發言稿後，認為問題不少，他遂於 3 月 10 日找周揚詳談，建議發言稿經修改後作為學術文章，在《哲學研究》上發表。惟王若水把周揚的講話全文刊登在 3 月 16 日的《人民日報》上，立即引起了廣泛的震動。

1983 年 10 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強調「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並發出清污指示，於是開展了一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領導這場運動的要員是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和鄧力群，還有中央黨校校長王震。他們都發

表了反「精神污染」的講話和文章，從理論層面批判「抽象的人道主義」與「社會主義異化」的觀點，矛頭直指王若水及周揚。值得注意的是，清污運動的目的是批判衝擊「四項基本原則」的過右言論，但運動一開始，保守派就興風作浪，且氣焰逼人，弄得全國人心惶惶。鄧小平因為擔心繼續批右會導致「左」傾回潮，嚴重影響快將上馬的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所以在 1984 年 5 月便結束了清污運動。

政治體制改革的初試與困境

鄧小平早在 1980 年就指出中國必須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並且提出了很多重大的改革措施。要注意的是，鄧所講的「政治體制改革」(political system reform)與外界所認識的「政治改革」(political reform)是有分別的。中國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並非要取締現行的社會主義政體，而是要使它更趨完善，以提高行政效率，為「四個現代化」服務。實際上，政治體制改革即外界所稱的「行政改革」(administrative reform)。

政治體制改革由於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遠遠落後於鄧小平原先的設想。直至 1984 年底，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成績包括：通過了 1982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恢復了黨總書記、國家主席與副主席的職位；改善了人大選舉法（如引入差額選舉）；通過了刑事法和一系列經濟法規；建立了幹部退休制度；並在某程度上精簡了中央的領導機構。

(乙) 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發展及波折：中共中央總書記 胡耀邦、趙紫陽下台；六四事件；治理整頓 (1984 年底—1991 年)

由於農村改革取得卓越的成就，鄧小平決定將改革帶到城市，因而開展了以城市為中心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新局面。

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的召開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標誌著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

會議決定：經濟體制改革的大方向是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即一方面縮減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劃(mandatory plans)，另一方面加強無約束力的指導性計劃(guidance plans)及市場調節(market regulation)的比重。儘管「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一種語詞矛盾的提法(a contradiction in terms)——它包含著「計劃」和「市場」兩個相互矛盾的概念，但它卻能滿足支持計劃經濟及支持市場改革的兩派（即以陳雲為首及以鄧小平為首的兩派），因此具有實際意義。但問題是「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應作何解釋？陳雲為解決上述問題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個基本原則，即在肯定計劃經濟體制的前提下，允許搞一些市場調節。陳雲是眾所週知的計劃經濟旗手，但他相信國有經濟不必統得太死，應留點空間讓多種經營和小生產發展，所以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作為發展商品經濟的規範。其實，這個提法與晚清改革派主張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如出一轍，它反映出陳雲承認「計劃」和「市場」各有好處與不足之處，並主張拿「市場」的好處去補「計劃」之不足。誠然，直到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止，「計劃」和「市場」的關係純粹是「主」與「輔」的關係。可想而知，陳雲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經濟體制改革的全面開展

十二屆三中全會結束後，中國進入了經濟體制改革全面開展的新階段。重要的改革包括：價格改革、企業改革及擴大對外開放。

價格改革的推行

推行價格改革與創立經濟特區一樣，均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政府排除了一下子全面開放價格的可能性，因為政府恐怕沒法應付震蕩治療式改革的風險。

準確地說，價格改革是從擴大企業自主權開始的。1984年5月，國務院發出指令，企業在完成指令性計劃之後，其自銷產品（即超產部分）可在不高於計劃價格20%的範圍內浮動。到1985年1月，國務院乾脆把20%的限制也取消了，自銷產品的價格由企業根據市場自行決定，或由供需雙方自由協定，政府不加干涉。這樣，同一種產品就有兩種價格——計劃內的計劃價格（官價）和超產部分的市場價格（市價），即人們所說的「雙軌價格」。新訂政策無疑使中國經濟走上「雙軌制」(double-track pricing system)的道路，它更為某些人提供發大財的機會。價格改革一開始，社會上就出現一批投機分子，人稱「倒爺」(profiteers)，因為他們把計劃價格的商品倒到市場上去賣而賺大錢。當然，能當「倒爺」的都是有權力和背景的人，故群眾又稱之為「官倒」(official profiteers)。對「倒爺」或「官倒」藉權營私的行為，社會深惡痛絕。

市場價格具有三項功能：其一是傳遞市場信息；其二是為生產提供刺激；其三是分配收入。社會主義中國雖然走上了開放價格之路，但由於價格改革是在「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及「雙軌制」的條件下進行，因此，當時中國的價格尚未能發揮市場價格的正常功能，是「扭曲價格」(distorted price)。在此一提，當時外界（主要是香港與台灣）的中國問題分析家用「鳥籠經濟」(birdcage economics)來說明價格改革在陳雲主導下有先天的局限性——開放了的價格是「鳥」，計劃經濟是「籠」，意謂任憑「籠」內的「鳥」怎樣飛，牠也飛不出那個預設的「籠」。但筆者認為，問題不在「籠」的存在與否，因為自由市場並非沒有「籠」；「籠」的大與小，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企業改革的推行

簡而言之，企業改革包括：

第一，實行政企職責分開，以擴大企業的自主權；

第二，實行廠長負責制，即由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改為實行廠長負責制，將企業的生產、經營、盈虧交廠長全盤負責；

第三，實行勞動合同制，但只限於法例通過後受聘的勞工；

第四，試行企業破產法；

第五，首次發行中國企業的股票，並在上海和深圳設立股票市場。

對外開放的擴大

開放政策始於華國鋒的主政時期。由於 1979 年 2、3 月間爆發中越戰爭，導致國家財政出現困難，剛掌權的鄧小平遂宣佈中國自該年 6 月起將進入三年經濟「調整」期。開放政策因此一度受到影響，並體現於外商對中國投資環境質量下降表示不滿。1984 年初，中外經濟關係重現生機。10 月，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展，對外開放亦隨之擴大。當時的主要政策包括：

第一，擴大對外貿易，准許地方外貿公司保留部分外匯，另對人民幣實行貶值，以提升中國在國際貿易上的競爭能力；

第二，鼓勵外商作直接投資，其形式採取中外合資或外商獨資皆可，並通過法令保護投資者的利益；

第三，繼四個特區之後，又將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 14 個港口城市對外開放，並給予優惠政策及准許（溫州和北海除外）設立經濟技術開發區；

第四，劃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的 61 個市、縣為沿海經濟開放區，建立以外向型為主的經濟，爭取多出口、多創匯；

第五，向國際金融機關貸款以加速國內的經濟建設；

第六，以中外合資形式在國外進行投資；

第七，擴大旅遊事業，爭取多創外匯；

第八，鼓勵學生、學者出國留學、交流，學習外國先進科技。

政治體制改革再上馬

如前所述，鄧小平早於 1980 年已指出中國急需推行政治體制改革，惟這方

面的改革離他的要求還差得遠。城市體制改革開展後，鄧再次強調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迫切性。他於 1986 年 9 月 3 日談到這個問題時說：「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9 月 13 日，鄧小平在另一次談話中指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至於改革的內容，他又解釋說：「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問題。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

八五、八六學運：胡耀邦下台與第二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開展

大刀闊斧的經濟體制改革開展後，社會上很快便出現複雜的情緒，一方面是樂觀及高升的期望，另一方面是不安和怨憤。經濟改革上了新台階原本是一件令人震奮的好事，但過熱的經濟發展卻帶來通貨膨脹、貪污腐敗及分配不公等問題，以致民怨沸騰。1985 年 9 月，北大學生藉紀念「九·一八」事件發起以「反對日本經濟侵略」及「抵制日貨」為號召的學運，部分學生更將矛頭直指「北京的腐敗」。由於黨中央做了大量的游說及宣傳工作，又作了嚴密的部署，學潮終於平息，但引發這次學潮的種種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

1986 年初，被外界稱為「開明派」的中央高層人物（包括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啓立、朱厚澤、王蒙等人）爲了防止 1985 年學運的重演及對學生的訴求作出回應，決定雷厲風行地端正黨紀、擴大反貪污、打擊經濟犯罪活動，並在深化改革開放的基礎上落實「鞏固、消化、補充、改善」的新八字方針。他們開創了一個寬鬆的政治局面，好讓改革開放在不受困擾的條件下順利進行。由於出現了這個新的歷史契機，黨內外不少著名的高級知識分子（如嚴家其、蘇紹智、李洪林、方勵之、溫元凱、于浩成、王滬寧、劉賓雁及王若望等人）又活躍起來

了。他們相繼發表大膽開放的言論，主要是批評腐敗現象及要求加快民主化進程。社會上改革的輿論迅速升溫。可惜的是，期望愈高，失望愈大。儘管中央一再三令五申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按照指示辦事，惟各項改革仍因阻力重重停滯不前，而貪污腐敗之風不但未被遏止，反而變本加厲，人們對此無不義憤填膺。

1986年12月，中國再次爆發學生上街示威遊行運動。這次示威由安徽合肥的大學生發起，並迅速蔓延至武漢、成都、昆明、西安、長沙、南京、杭州、廣州、深圳、上海、北京及天津等地。不少人還將矛頭指向「四項基本原則」。面對全國性的激烈學潮，鄧小平遂於12月30日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啓立及李鵬等人，批評他們未能平息學潮：「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裏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鄧繼而作出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示：「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盡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方針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盡量避免流血，寧可我們自己人被打傷，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

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批評胡耀邦後接受了他辭去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請求，但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政治局又將一批進行「自由化」活動的黨內知識分子開除出黨。到1月底，持續了一個多月的學潮終於平息。

當時外界盛傳鄧小平是受陳雲的壓力才讓胡耀邦下台的。其實，這是沒有根據的揣測。胡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是鄧小平及一些黨內元老對他完全喪失了信任。據悉，鄧小平很不高興胡耀邦在兩方面的表現：其一是胡反「自由化」不堅決，讓「自由化」泛濫；其二是胡在1985年5月10日接受香港《百姓》雜誌主編陸鏗訪問時談了一些在改革中改革派和保守派鬥爭的情況。陸鏗回去後寫了

《胡耀邦訪問記》，讚揚胡耀邦，批評保守勢力。鄧小平知道後大為不悅，並在某個場合對楊尚昆這樣說：「陸鏗打著奉承耀邦的幌字來反對我們！」及「這幾年我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就是看錯了胡耀邦這個人！」

胡耀邦落馬、知識分子被開除黨籍、學運被遏止、反資運動開展——上述的一連串事件確使不少外界人士（尤其是學者和投資者）擔憂。他們對中國政局的穩定性產生疑問，並認為改革開放正在倒退中。其實，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決心絲毫沒有動搖，只是他相信若要改革開放成功，就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局面，所以有需要消除破壞穩定的「自由化」活動。1987年4、5月間，當鄧小平覺察到黨內的「思想警察」（如胡喬木、鄧力群等人）企圖利用這場反資運動來攻擊整條改革開放路線時，他便公開表示「搞四個現代化……著重反對『左』，因為我們過去的錯誤就在於『左』，「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鄧小平再次當機立斷結束反資運動，阻止了「左」傾回潮。從5月開始，改革開放的言論又高唱入雲了。

中共「十三大」的召開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在反「左」的氣氛中召開。趙紫陽接替倒台的胡耀邦向大會作《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並在報告中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該理論有兩層含意：第一，中國社會自1950年代中期開始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能倒回去搞資本主義；第二，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要循序漸進，以達到基本實現現代化為止。趙紫陽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將會延續到21世紀中葉；現階段的基本路線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及堅持開放政策為基本點。

「十三大」確認「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在強調發展生產力的前題下，會議進一步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即國家只會用宏觀控制經濟的手段來調節市場，而不會參與個別企業的微觀

決策。值得注意的是，「十三大」首次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內容，容後再作交代。

經濟及政治體制改革的全速前進

「十三大」閉幕後，趙紫陽領導中國向改革的深度和廣度全速前進，由此而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現先說明各項重大改革的主要內容，再談趙紫陽加速改革所引起的反響。

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

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整個構思，實際上來自國家計委副研究員王建所提倡的「國際大循環」理論。該理論建議中國首先利用農業的剩餘勞動力重點發展四類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紡織和服裝加工業、食品加工和飲料業、輕工雜品產業，以及勞動密集型機電產業，然後用出口產品賺取外匯，再用外匯來購買設備和技術以發展重工業，從而建立農業和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係。

趙紫陽於 1987 年底到上海、浙江、江蘇、福建等沿海省、市考察後指出，世界上隨著勞動費用條件的變化，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正向勞動費用低的地方轉移；因此，中國沿海地區應利用其相對優勢，抓緊這個機遇，大力發展勞動密集的外向型經濟，把大批外資吸引進來，並在生產和經營的過程中堅持「兩頭在外」（即把原料來源和產品銷售都放到國際市場上去），以避免和內地爭原料、爭市場。從 1988 年 3 月開始，政府大力推行這套經濟發展戰略，這體現於沿海地區「三資企業」（即外商獨資企業、中外合資經營、中外合作經營企業）長足的發展。趙紫陽更鼓勵在中外合資、合作企業中試行「一企兩制」，即在同一企業中劃分若干廠房給有管理經驗的外商直接管理，或由外商在國外聘請人才來管理，好讓國內廠長學習按照國際慣例管理企業。對思想比較保守的人來說，讓外商管理企業實有導致喪失國家主權之嫌。

「勇闖物價關」

1988 年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和國務院總理李鵬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方針上出現了分歧。是年 3 月，李鵬還公開強調當前最迫切的任務是要完善「企業改革」，惟趙紫陽於 4、5 月間又公開表示經濟改革的重點是推行「價格改革」，要「勇闖物價關」，取締「雙軌制」，以達官價與市價兩價歸一的目的。

5 月底，中央政治局議決推行「價格改革」。6、7 月間，先後開放了白糖、鮮蛋、大白菜、豬肉、彩電、棉布、棉紗、名酒、名煙等物品的零售價格，導致各地物價全面大幅上升。6 月，通脹達 16.50%；7 月更上升到 19.30%。8 月，一般老百姓為保值起見紛紛從銀行提出存款，盲目搶購貨品。趙紫陽「勇闖物價關」的希望，至此可謂全盤落空。自 9 月起，中國經濟進入了「治理整頓」的階段。

政治體制改革的全面推行

儘管鄧小平在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展後一再指出只有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才能保障經濟改革的成果，但由於受到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收效甚微。「十三大」後，趙紫陽銳意推行以下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措施：

- 第一，實行黨政分開，逐步撤銷黨組；
- 第二，進一步下放權力，直到基層為止；
- 第三，精簡政府工作機構；
- 第四，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包括引入公務員制度；
- 第五，建立社會主義協商對話制度；
- 第六，完善人大、政協制度；
- 第七，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建設。

上述措施反映出趙紫陽主張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全面和徹底的，並意味著權力和利益會重新分配，這正好解釋為何一般黨政幹部視趙的政改措施為洪水猛獸，以致在執行方面舉步為艱。

改革進退維谷：八九民運；趙紫陽下台；「六四事件」

「十三大」後，趙紫陽爲了打破改革的困局，決定大膽闖關，結果以失敗告終。闖關觸礁，一方面是由於改革步伐太快，亂了陣腳；另一方面是因爲某些體制上的重大改革措施觸動了現存勢力的切身利益，引起他們的集體對抗，令改革停滯不前。趙紫陽受到建制內部強大的阻力，又面對知識分子和學生越來越難滿足的要求，可說是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令他感到更爲難的，是物價闖關未見其利先見其害——通脹、搶購潮的湧現，使他束手無策，備受反對其政策的人責難。1989年，趙紫陽重蹈前任總書記胡耀邦的後塵，即因處理學潮失當而黯然下台。現將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的爆發、過程、轉折及結果簡述如下：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學生藉悼念胡耀邦分別向人大代表及總理李鵬提出他們的政治理想和要求，學潮再起，並迅速蔓延到西安、長沙等大城市。由於學生爭取民主的行動得到教師、知識分子及新聞界的普遍支持，運動遂向社會蔓延，形勢急轉直下。

4月24日，即在趙紫陽出訪朝鮮的次天，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將學運定性爲「動亂」。26日，《人民日報》根據這個決定的精神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1995年12月，趙紫陽在接受楊繼繩訪問時表示：「『六四』的根本問題是【四·二六】社論」，因爲該社論「引出空前規模的群眾抗議。」）

5月13日，數千北京學生藉蘇聯改革派領袖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快將訪華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藉此行動向中央施壓，以爭取成立壓力團體。儘管趙紫陽勸說學生必須克制，以免破壞中蘇高峰會議的進行，學生的情緒卻轉趨激烈，並否定所有妥協的主張。

5月15日，戈爾巴喬夫抵京。16日，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會晤時公開表示：「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17日，北京爆發了百多萬人上街聲援絕食的大遊行，不少人將矛頭直指鄧小平。同日，全國有27個城市的170所高校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的絕食學生。

5月19日晚，李鵬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首都黨政軍機關幹部大會上宣佈戒嚴令，並從外地調派解放軍進京，這反映出黨內強硬派取得勝利、溫和派徹底失敗。

5月下旬，北京學生及市民無懼戒嚴令，繼續大規模地上街遊行示威，並組成糾察隊和各類自治團體，使首都陷於半癱瘓、無政府及人民自治的狀態。至此，學運已轉化為一個龐大的民眾運動。隨著大量外地學生陸續湧進北京，整個運動變得更加強大、複雜、激烈及難以控制。

由於戒嚴令未能生效，而民眾又堅守天安門廣場，中共強硬派終於在6月4日出動軍隊清理天安門廣場，以武力結束八九民運，造成震驚一時的「六四事件」。

穩定壓倒一切：「六四事件」後的政局與中共對當前危機的回應

「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共不只要面對國內人心不穩與經濟滑坡的困境，它還備受國際社會輿論的指責及眾多西方國家的制裁，再加上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的衝擊，可以說，中共正陷於自改革開放以來最深的危機。在這四面楚歌的情況下，鄧小平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的「十六字方針」，帶領中共渡過難關。

鄧小平首肯同意中共中央政治局用武力平息八九民運，是無可諱言的事實。當時只有鄧小平一個人有權調動軍隊，因為他仍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時說道：「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雖然有一些同志一時還不理解，但最終是會理解的，會支持中央這個決定的。」鄧繼而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不正確？……第二個問題，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對

不對？」他接著作了十分明確的回答：「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沒有錯。沒有改革開放，怎麼會有今天？……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可見，儘管鄧小平認為中共有需要用強硬手段消滅任何挑戰其領導權威的勢力，但他卻一直堅持要把市場改革及開放政策貫徹到底。

當時要急需解決的，是中央總書記的接班問題。據悉，正當鄧小平考慮由誰來接替趙紫陽的時候，李先念和陳雲一再向鄧推薦上海市領導人江澤民，說江是堅持「兩個基本點」的好幹部，力主調江到中央。鄧小平很快接納了二人的建議。6月23—24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十三屆四中全會，議決撤銷趙紫陽所有職務；任命江澤民為中共中央總書記。9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籍華裔學者李政道教授時談到胡耀邦與趙紫陽下台的問題，並解釋說：「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並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選的時候沒有選錯，但後來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四個堅持中最核心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四個堅持的對立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些年來每年我都講多次，但是他們沒有執行。在這次動亂中趙紫陽暴露了出來，明顯地站在動亂的一邊，實際上搞分裂。好在有我在，處理不難，當然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作用。」

江澤民當上中央總書記後，由於面對嚴峻的形勢，所以實施了一系列針對時局的政策。在政治方面，其政策的重點包括：加強思想工作、加強黨的建設和領導、推行廉政建設、懲治貪污腐敗，以及抵抗西方對中國推行「和平演變」（即「打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以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經濟方面則強調繼續「治理整頓」，將過熱的經濟降溫，遏制通脹，並從穩定中求適度的發展。

有需要指出，「六四事件」發生後，中央高層對中國改革的大方向問題產生了分歧。如前所述，鄧小平始終不渝地堅持市場改革的路向，但以陳雲為首及以鄧力群為首的一些較保守的高層幹部則將近年來中國社會出現的通貨膨脹、貪污腐化、分配不公、政治動亂等問題，全歸咎於市場改革。他們認為要辨清改革的

性質，並要對各項改革措施問清楚究竟是姓「社」（社會主義的改革）還是姓「資」（資本主義的改革），以防止發生「資產階級自由化」及「和平演變」。爲了回應保守派對其改革開放路線的挑戰，鄧小平遂於 1992 年春節期間作出了南巡之舉。

（丙）改革不走回頭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1992—1997 年）

鄧小平南巡

1991 年底，蘇聯瓦解。當時不少西方國家預言，中共也很快會垮台。東歐與蘇聯變天，使中共中央高層傾向於保守，並藉強化意識形態來防止「和平演變」在中國發生。他們反覆宣傳，市場取向就是資本主義取向，而市場經濟就是「和平演變」的溫床。惟鄧小平指出，東歐共產政權崩潰與蘇聯解體，基本上是因爲它們推行經濟改革失敗，所以，中國若要避免遭受同一命運，必須繼續走改革開放的道路。1992 年 1 月的中、下旬，鄧小平南下深圳、珠海、廣州等地，大力表彰市場經濟的成效，藉以扭轉當時國內的保守局面。

南巡期間，鄧小平作了多次重要的講話，說明：「特區姓『社』不姓『資』」，「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發展才是硬道理」，要「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在反駁有關社會主義必需是計劃經濟的提法時，鄧小平解釋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他還特地指出當前的基本任務是防「左」：「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爲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鄧小平在講話中不點名批評了陳雲、鄧力群等人，旨在爲深化市場改革亮起綠燈。

鄧小平南巡講話傳返北京後，一度受到掌管意識形態的保守派封鎖。但由於各地傳媒紛紛發表支持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文章，而與鄧小平一起南巡的楊尚昆又在軍中開展學習鄧的南巡講話，中共中央遂於 1992 年 2 月底整理了這個講話的要點，以中共中央 1992 年 2 號文件下發全體黨員，由此結束了歷時三年半的「治理整頓」，並掀起了新一輪的經濟熱潮。

鄧小平南巡掀起的經濟熱潮

鄧小平南巡後不久，全國掀起搞「翻番」狂潮；所謂「翻番」，即追求當地國民產值或工業產值成倍增長的高速度發展。各地同時又出現投資狂熱，這主要體現於下列三大熱點：

第一，房地產熱——1992 年，全國房地產公司冒出近萬家，出讓土地為前 5 年總和的 5 倍，地價與房價因此持續上升；

第二，開發區熱——僅 1992 年上半年計，全國各地自辦的開發區就有 1,800 多個，然而，大部分並無足夠資金進行基建（如通電、通水、通訊及平整土地等工程）；

第三，股票熱——1992 年，僅上海一地之股民就從 3 萬多人增至 120 多萬人。10 月，中央政府成立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大批國營企業被轉化為股份制公司，並在上海及深圳股票市場發行 B-股，以吸引外資。

此外，中央政府在 1992 年先後開放了 571 種商品的價格。到 1992 年底，由市場調節的商品比重已達 80%。通脹因全面開放價格捲土重來，高達 13%。

中國又於 1992 年實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一方面以上海浦東為龍頭，開放長江沿岸城市，西至四川重慶；另一方面開放東北、西北、西南沿邊界的城市，形成周邊對外開放格局。到 1992 年 10 月，經國務院批准的開放城市已達 300 多個。國務院又批准逐步開放交通、商業、飲食、金融、保險、房地產等第三產業（即廣泛意義上的服務業）予外商投資。

中共「十四大」的召開：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里程碑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全國刮起「鄧旋風」的氣氛中召開。江澤民在會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於「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在歷史唯物論中是處於矛盾的對立面，「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反映出中共已掙脫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束縛。從實際意義而言，「十四大」標誌著市場改革派的勝利——中共自此以「計劃」和「市場」的不同「功能」來界定兩者在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而不再把「計劃」和「市場」看做「主」與「輔」的關係。換言之，「計劃」不再擔當發展經濟的主導角色，它只為宏觀社會經濟發展制定理順戰略目標而已。從這個角度看，「十四大」可以說是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標竿。

「十四大」確認了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求把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看齊。會議又提出要審慎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並強調精簡機構以提高行政效率，但不提撤銷黨組。

經濟失衡與宏觀調控的開展

1992年刮起「鄧旋風」，使沉寂了三年多的中國經濟再度活躍起來，並朝著市場經濟的方向大步邁進。然而，由於市場法規未能及時建立起來，又由於政府未能及時制定有效的調控經濟措施，致使中國在1992—1993年間出現經濟局部過熱及金融秩序混亂的失衡現象。以下簡單分析上述現象及政府的對策。

經濟過熱的基本原因是各地上馬項目過多，兼且投資規模過大。但要指出，當時中國的經濟只是「局部」過熱，因為資金大部分集中在新興的、投機性很強的領域裏，而正常的投資領域資金則極為短缺。至於金融秩序出現混亂情況，大抵是社會非法集資風氣泛濫及銀行違章拆借失控所致。當時不少金融機構人員及企業領導人濫用本身職權，調動銀行及社會上的閑散資金，往沿海各地進行炒賣股票及房地產等投機活動，導致金融形勢日益嚴峻。有中國經濟學者把這些炒房地產、炒股票、炒期貨的「官倒」稱為「貨幣倒爺」，並指出他們的破懷性遠大

於 1987—1988 年間倒賣汽車、化肥等商品的「物資倒爺」。毋庸諱言，經濟局部過熱與金融秩序混亂不但使全國生產資料及資金陷於緊張狀態，更加劇了 1992 年全面開放價格所帶來的通貨膨脹。1993 年 6 月，通脹上升到 25%。

爲了解決當前的經濟危機，中共決定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措施，由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負責推行。1993 年 6 月 24 日，黨中央及國務院聯合公佈《宏觀調控十六條》，旨在「治亂」和「治熱」。有關「治亂」方面的主要措施包括嚴格規管銀行業務、嚴禁非法拆借及集資、加強股票市場及房地產市場的宏觀管理，以及強化稅收管理。至於「治熱」方面的主要措施，則包括嚴格審批新投資項目、嚴格控制銀行信貸規模、提高利率以增加儲蓄存款、限期完成國庫債券的發行，以及遏制通脹。要澄清的是，加強宏觀調控並非如某些中國問題分析家所說的是恢復計劃經濟或全面緊縮——它是在肯定市場改革的前題下進行的，是以經濟立法來進行結構調整，而且範圍主要限於金融領域。

誠然，中共在加強宏觀調控的同時，還加速推行經濟體制邁向市場化的改革。1993 年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通過由朱鎔基制定的《(市場)改革五十條》。該文件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文件又爲企業、金融、財稅、投資及外貿等改革訂下目標和策略，故可以說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和行動綱領。

總而言之，一年多的宏觀調控確實收到「治亂」和「治熱」之效。至於同期推行的多項經濟體制改革中，財稅體制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尚算成功，相反，國有企業、金融體制及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則明顯滯後。

鄧小平時代的終結

鄧小平因身體原因自 1994 年開始就不管國家大事了。陳雲也於是年 8 月動了大手術，並於 1995 年 4 月逝世。到此，中國的「雙峰政治」格局正式瓦解。1997 年 2 月，鄧小平逝世，中國遂進入後鄧小平時代。

鄧小平個性很強。他不喜歡空談，喜歡快刀斬亂麻，是一個作風強硬務實、

急於抓出成效來的強人，故有「鋼鐵公司」之稱。此外，他還是個意志堅定不移、老是按照自己的一套想法去幹的人。葉劍英曾這樣評論鄧小平：「他這個人歷來如此，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喜歡一個人打天下，不撞南牆是不會回頭的。」

若說毛澤東時代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群眾運動方式辦事的一人專政的極權(totalitarian)時代，那麼，鄧小平時代可說是一個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社會走向開放但仍須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專制(authoritarian)時代。

(三) 20 世紀末的中國

鄧小平逝世後，外界一度揣測中國會否繼續由他開創的改革開放事業。1997年9月召開的「十五大」終使外界釋疑，因為該會不只肯定鄧小平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還將「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中共的指導思想」這個提議明確寫進黨章。

爲了回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急需解決的問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於2000年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即：「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基本利益。」

以下簡述20世紀末中國農村及城市的一般情況，以展示現今中國所面對的重大問題。

20 世紀末的中國農村

20世紀末，中國農民人口約9億，佔總人口的70%；其中失業或就業不足人口約2億，離村流動人口約7,000—8,000萬。1998年，湖北村幹部李昌平上書總理朱鎔基，論述「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反映出嚴峻的「三農」（即農業、農村、農民）問題。

如前所述，1979 至 1984 年是中國農業走出低谷的黃金時期。從 1982 到 1986 年，中共中央每年下發的「一號文件」都以改善農業為主題，這反映出黨中央對農業及農民問題十分關注。惟自城市經濟體制改革開展以來，由於國家對農業的基本建設投資大幅度減少，又由於農用生產資料價格不斷上漲，加上農業勞動力大量轉向非農業的生產，因此，主要農產品產量就出現滑坡下降趨勢，嚴重影響務農者的生計。誠然，農村形勢每況愈下，亦涉及到基層政府的管治素質問題，而這又與人民公社解體不無關係。中國的 52,789 個人民公社於 1983—1985 年間全部解體，而在此之前，鄉鎮政府所有辦公經費一律由縣撥給，它既無權也無錢增設機關或增聘人員。人民公社解體後，中國出現了 61,766 個財政獨立的鄉鎮政府。由於國家允許它們將地方收益（如鄉鎮企業上繳的利潤、集資款項、捐款、罰款等等）作為鄉鎮財政的自籌收入，不少鄉鎮政府便乘機增設機構、增聘人員，攤子越鋪越大。同時，地方上又普遍出現所謂「三亂」——「亂徵收、亂集資、亂罰款」的情況，總之是苦了農民。在改革開放當初，據估計農村一畝地平均負擔鄉鎮政府經費約 10 元，到 20 世紀末，少的負擔要 100 多元，多的更漲到 200—300 元。儘管中央政府曾三令五申遏制「三亂」，地方政府卻聽而不聞，更嚴厲對待上訪告狀的人。有關情況，詳見陳桂棣和春桃寫的《中國農民調查》。該書作者花了三年時間跑遍安徽，發現省內有 50 多個縣沒有一個按照國務院規定辦事，地方主義的膨脹可謂表露無遺。還有一項值得注意的是，自 1980 年代中期開始，地方政府往往購買農業副產品不交現金，長期發「白條」（即欠單），令農民生計大受影響。1990 年代又掀起房地產熱潮，農民更飽受「圈地運動」之苦。

人民公社解體後，農民再不能獲得社會福利保障，而中國又沒有獨立的農民協會為他們爭取經濟權益，故動亂隨農村情況轉壞而劇增。據有關資料顯示，在 1992 年，農民請願、示威、暴動事件有 9,000 宗；到 2000 年，激增至 100,000 宗。一些農民更為了生活而參加了地下組織，包括地下教會。

1990 年代中、後期，中央政府為了舒緩農村的緊張局勢而制定了一系列新

政策，這主要包括：

- 第一，精簡基層行政機構，重建基層黨組，改善及提高地方領導的質素；
- 第二，規定公糧不得超過農民收入的 5%；
- 第三，在鄉村選舉中實行全民投票；
- 第四，建立中、小型市鎮以吸納更多農民；
- 第五，開發中國西部，為農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由於「三農」問題繼續日益惡化，中共中央終於在 2004 年再次下發以改善農民生計為主題的第 6 個「一號文件」，反映出黨中央下定決心要解決「三農」問題。

二十世紀末的中國城市

改革國營企業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項重點工作。1998 年，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依「抓大放小」的方針整頓國企。他首先選擇了 500—700 個大型國企作為改革對象，然後向它們提供優惠貸款，再將這些經過整頓、合併的國企在上海和深圳上市。一般而言，國家擁有它們 20—30% 的股權。其他中、小型國企則以低價賣掉。

工人失業在 20 世紀末的中國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官方有關數字顯示，城市工人的失業率為 4%，但據不少外界專家估計，城市失業率實不低於 10%。1999 年，經國家仲裁的勞工糾紛有 50,000 宗，至於沒有記錄可稽查的糾紛則數不勝數。工人對處境不滿常常引發暴力事件，尤以西部、華中、東北三個地區最為嚴重，但各地所發生的暴力事件大抵沒有關連。由於中國沒有獨立的工會組織為工人爭取經濟權益，為了緩和失業工人的不滿，政府向他們發放生活補助金；到 1999 年，補助金增至每月 300 元。

20 世紀末的中國城市出現了一股以「中產階級」為代表的新興力量。所謂「中產階級」，是指社會上有消費能力的人，主要包括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及各類專業人士。中共把這個新興的富裕群體視為有助於穩定社會的進步勢力。

2001年7月，中共在江澤民推動下准許「中產階級」人士入黨。儘管這個決定只是確認一個既成事實——即少部分黨員已於1990年代蛻變成「中產階級」，但該項決定乃中共歷史上一破天荒之舉（按：20世紀末，在6,600萬中共黨員中，大約有50萬是「中產階級」）。可以說，中國共產黨正由一個工農黨慢慢轉化為一個「全民黨」。

(四) 20世紀80、90年代改革開放的總評價

中國經濟在20世紀末業取得長足的發展，是無可諱言的事實。1978年，中國的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 國內生產總值)為3,624億元；到2003年，增至116,694億元。人均GDP則從1978年的379元增至2003年的8,469元。1979—1990年，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為9.70%；1991-1994年為11%；1995年以後為7%。上述數字充分反映出改革開放的卓越成就。但須注意的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實靠赤字開支(deficit spending)來推動，這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是不利的。此外，中國還面對嚴重的糧食短缺問題，主要原因包括：第一，人口龐大，兼且繼續膨脹；第二，生態環境日益惡劣；第三，耕地日漸減少。上述現象又反映出中國有很多重大問題仍待解決。

在社會方面，改革開放為中國人民帶來了一個相對寬鬆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使人們在工作和生活中有較多的選擇和機會。但改革開放亦導致若干不良現象湧現。其一是商品化的現象——勞動力、土地、文化全都被商品化；其二是分配不公的現象——地域之間與社會階層之間皆出現嚴重分配不公的現象；其三是貪污腐化、道德淪亡的現象，促使罪案日增、治安日壞。上述現象解釋為何改革開放年代的中國社會仍然呈現不安和不滿的情緒。

改革開放令中國變好還是變壞，這屬見仁見智的問題。毫無疑問，中央領導人是有意去搞活經濟、安民恤眾的；然而，很多重大問題仍沒法解決，其中一個原因是地方越來越不受中央管制。縱然如此，中共至今仍佔統治地位，亦即是說，

改革開放已達到它的基本目標。

倘若你問當今的中央領導人對於改革開放有何評價，我相信他們心底裏會如毛澤東於 1959 年 7 月在廬山上那樣說：「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已成爲歷史，中共領導人一定慶幸社會主義中國沒有步它們的後塵。至於現今的中國是否社會主義國家，這亦是一個具爭議性的問題。

參考書目

- Fairbank, J.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 10 (1978); Vol. 11 (1980); Vol. 12 (1983); Vol. 13 (1986) [Vols. 10 & 11: 1800-1911; Vols. 12 & 13: 1912-1949]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 1800-1911 年》上、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年）
章建剛等譯：《劍橋中華民國史》第一、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992 年）
- Hsu, I.C.Y.,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th edition, 2000)
徐中約著，計秋楓、朱慶葆譯：《中國近代史》上、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2001 年）
- MacFarquhar, Roderick & Fairbank, John King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4,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I,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49—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Vol.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2,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謝亮生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革命的中國的興起 1949—1965》（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
金光耀等譯：《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金春明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 Meisner, Maurice,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杜蒲、李玉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後毛澤東的中國—人民共和國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
- Meisner, Maurice,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New York: Hill and Wong, 1996) [未有中譯本]
-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nd edition, 1999)
史景遷著，溫洽湓譯：《追尋現代中國》
上冊：《最後的王朝》（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中冊：《革命與戰爭》（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下冊：《從共產主義到市場經濟》（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 Cheng Pei-kai & Lestz, Michael (eds.), with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A Documentary Collection* (New York: Norton, 1999)
- 金耀基 (King, Ambrose Y.C.) : 《中國的現代轉向》 [*The Modern Turn of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參考書目

陳勤、李剛、齊佩芳：《中國現代化史綱》

上卷：《無法告別的革命》(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下卷：《不可逆轉的改革》(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蕭超然、沙健孫主編：《中國革命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

張憲文：《中華民國史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彭明、程肅 主編：《近代中國的思想歷程，1840-1949》(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

曾業英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

郭鐵鎗主編：《台港中共黨史中國現代史研究評析》(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增訂本(臺北東華書局，2001年)

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一至十輯(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1982年)

第一輯 總論

二 史料與史學

三 辛亥革命

四 民初政局

五 軍閥政治

六 五四運動

七 護法與北伐

八 十年建設

九 八年抗戰

十 國共鬥爭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修訂本，上、下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年)

朱建華、朱陽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張家敏：《建國以來 1949—1997》上、下冊(香港政策研究所，1997年)

參考書目

姜華宣、張尉萍、肖牲主編：《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紀事(1921—2001)》(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新時期歷史大事記〔增訂本〕(1978.12—2002.5)》(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02年)

浦興祖等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

鄭宇碩、謝慶奎主編：《當代中國政府》(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2年)

江山主編：《世紀檔案：影響20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重要文章》上冊(北京團結出版社，1998年)

[下列各書有助瞭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歷史人物、事件及時代特色]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

凌志軍：《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蘇曉康、羅時敘、陳政：《烏托邦祭：廬山會議紀實》(香港全真社，1989年)

張湛彬、劉杰輝、張國華：《「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北京商業出版社，2001年)

徐勇：《包產到戶沈浮錄》(珠海出版社，1998年)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沈思：1966—1976年紀實》

1—3卷(華夏出版社，1986年)

4—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1989年)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香港三聯書店，1993年)

張戎著，張樸譯：《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台灣中華書局，1992年)

參考書目

- 陳凱歌：《少年凱歌》(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
- 梁曉聲：《一個紅衛兵的自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年)
- 鄭念著，鄭凱譯：《上海生與死》(臺北大鴻，1987年)
- 古華：《芙蓉鎮》(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7年)
- 梁恒、夏竹麗著，傅依萍、莫昭平譯：《革命之子》(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3年)
- 凌耿著，劉昆生、丁廣馨譯：《天仇：一個中國青年的自述》(香港新境傳播公司，1972年)
- 周倫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園書屋，2006年)
- 劉愛琴：《我的父親劉少奇》(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
- 人間：《共和國元首之死》(香港海明文化事業公司，198?年)
- 許冠三：《劉少奇與劉少奇路線》(香港中道出版社，1980年)
- 赤男、明曉等著：《林彪元帥叛逃事作最新報告》(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2000年)
-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
-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年)
- 張佐良：《周恩來保健醫生回憶錄 1966—1976》(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
- 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
- 王若水遺著：《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上、下冊(香港明報出版社，2002年)
- 李敏：《我的父親毛澤東》(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

參考書目

- 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証言》(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年)
-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4年)
- 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香港南粵出版社，1990年)
- 郭金榮：《毛澤東的黃昏歲月》(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0年)
- 蕭延中編：《晚年毛澤東》(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年)
- 葉永烈：《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廣州出版社，1997年)
- 鄧力群：《十二個春秋 (1975—1987)》(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年)
-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
- 楊繼繩：《鄧小平時代》(香港三聯出版社，1999年)
- 葉永烈：《陳雲全傳》(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
-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研究所，1997年)
- 張良：《中國六四真相》(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年)
-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Hong Kong 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年)
- 馬立誠、凌志軍：《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
- 何中石：《朱熔基》(遠方出版社，1998年)
- 杜林著：楊鳴鏞譯：《江澤民傳》(明鏡出版社，1999年)
- 馬玲、李銘：《胡錦濤》(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
- 楊中美：《中共新領袖—胡錦濤》(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 馬玲、李銘：《溫家寶：他的崛起與管治作風》(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

參考書目

年)

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